

托
洛
斯
基

論蘇聯的命運



歷史研究社出版



托洛斯基

茨

論蘇聯的命運

歷史研究社出版

本書著者托洛斯基說：

讓我們假定希特拉掉轉他的武器來反對東邊，侵畧紅軍佔領的區域（即東部波蘭——編者）。在這樣情形之下，第四國際的隊員無論如何不必改變對克林姆宮寡頭統治者的態度，但將出赴前綫爲目前的最迫切的任務，即以軍事力量來抵抗希特拉。

托洛斯基論蘇聯的命運

劉綺英編譯

1941.11.1.

版權所有	上海福州路
	歷史研究社刊行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初版
	每冊定價一元

序

近年來，國際上有一個運動，把本書著者，里昂·托洛斯基描寫為希特拉的密探和蘇維埃國家之破壞者。這個運動是蘇聯現存的統治層所領導的。在這一罪名之下，整代的老布爾什維克，列寧的戰友，內戰時代的英雄，都在莫斯科三次審判案和紅軍的肅軍之中被清除了。但事情還不止此。莫斯科所領導的運動，還把托氏描寫成爲十月革命中列寧的反對者，甚至內戰期中白軍的內應。這些宣傳是與事實相符的嗎？

爲使這小冊子避免給莫斯科的宣傳所影響，在這一問題上用文件來證明一下是必要的。在附載於十月革命成功後出版的『列寧全集』中的重要革命家底傳記上，關於托洛斯基有如下的播寫：『從帝國主義大戰開始之時，他就採取一種明顯的國際主義立場，……（一九一七年）在彼得堡他參加「區際派」組織，於一九一七年七月底第六大會上，在彼得堡與該組織一同加入布爾什維克黨。七月事件以後，他被克倫斯基政府所捕，罪名是「領導暴動」，但不久因彼得堡無產階級底反對而獲釋。彼得堡蘇維埃轉向於布爾什維克派之後，更被舉爲主席，且以這一資格，組織並領導了十月二十五日底暴動。他自一九一七年後，即爲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以及蘇維埃人民委員會委員，他担任外交人民委員長，一直到白

來斯脫——立陶夫斯克和約簽訂之時，以後被任爲軍事人民委員長。」

也許因爲這『全集』是加米尼夫所主編的，一般人還不能置信吧？那末，我們將舉出另一個更寶貴且更有趣的文件來。在第二百四十一號真理報上，史太林，即近年說托氏是蘇聯的破壞者的人，論『最優秀的黨領袖作用』時，用下面的話來証實官方關於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底記載：『實際組織暴動的一切工作，是在彼得堡蘇維埃主席，托洛斯基同志底直接領導之下進行的。我們可以確定地聲明：衛戍軍之迅速轉向於蘇維埃方面，以及革命軍事委員會工作之勇敢的執行，黨應該主要地與首先地感謝托洛斯基同志。』

里昂·托洛斯基，是十月革命的兩大領袖之一，是蘇維埃國家及紅軍的創建者，這一點已爲上述的文件証實了。托洛斯基，終其一生，都是蘇聯之忠實的擁護者與保衛者。不但如此。多年來，他還會爲蘇聯作辯護而與修正主義者作過激烈的論爭。早在一九二六年，史米爾諾夫諸人就認定官僚制度將開始代表再生的資產階級制度的利益，而無產階級必須以新的社會革命才能回到社會主義之路了。但托洛斯基反駁道：無產階級還未失去政權。保衛蘇聯仍是布爾什維克派底任務。一九二九年前後，德國的烏爾班茲所代表的『極左派』，認爲蘇聯已回復了資本主義制度，而官僚亦已成爲一個階級了。托洛斯基憤憤地答覆他道：蘇聯還是一個工人國家。資本主義制度要在蘇聯復辟，仍須經過一個流血的反革命。一九三八

年，意大利的布魯諾·R，認爲蘇聯和德國一樣，是官僚集體主義的國家。托氏斥這種說法爲謊言。一九三九年，史太林進攻波蘭與芬蘭，這一事實，甚至使『托派』隊伍之內的少數分子，也起而修正過去的政綱，并拒絕爲爭取紅軍的勝利而鬥爭。這一修正派以美國的詹姆士·盤納姆和馬克斯·夏克曼爲代表。但托洛斯基斥責他們爲叛徒，最後更與他們在政治上與組織上相決裂。從這些事實中，我們可以看出，本書著者里昂·托洛斯基，無時不在爲保護蘇聯而鬥爭的：一九一八—二二年時代，他以紅軍總司令的資格用武器來保衛；以後，用他天才的演說，和深刻的文字工作來保衛。

『托洛斯基以全力在反對蘇聯現在的領袖，他真正的在保衛蘇聯嗎？』也許有人懷疑。

這是不對的。我們試問：我們保衛工會以反對資本家摧毀牠時，是否一定要同時擁護領導這個工會的黃色官僚呢？反過來說，我們對黃色官僚保持不可調和的反對態度，就同時表示反對這些官僚所領導的工會嗎？當我們救一間着火的房子之時，我們不需要對佔據了這房子的強盜表示好感；反過來說，反對佔據了房子的強盜，這一事實，并不阻礙我們去救護這間房子，而使其避免毀滅於火災之中。這一淺近的道理，爲什麼不可以同樣應用於對蘇聯的保衛呢？革命者反對史太林，并不表示反對蘇聯，相反，反對史太林的工作正是爲着保衛蘇聯而進行的，正如反對工會官僚領袖的工作是爲着保衛工會而進行的一樣。

托洛斯基是蘇聯之忠實的擁護者與保衛者。在今天，即蘇聯遭逢納粹強盜瘋狂的侵襲之時，如果得到工人國家的創建者，工人國家的軍隊底第一屆總司令，內戰時代擊退帝國主義和白軍的老將軍——本書著者里昂·托洛斯基參加保衛蘇聯的工作，蘇聯將更有保證的。但是——唉——，他已於一九四零年八月廿一日為格柏烏和希特拉的密探所共同謀死了。

這是一個損失；但并不是損失了一切：托洛斯基已為全世界工人階級提出了一個精確的保衛蘇聯底政綱了。以蘇聯的創造者提出保衛蘇聯的政綱，其正確性是可想而知的。這一本小冊子，就是搜集自里昂·托洛斯基關於蘇聯的著作之中的。我們希望牠能帮助讀者更清楚地了解托氏的意見，并從此獲得保衛蘇聯之指針。

當這本小冊子出版之時，希特拉強盜正孤注一擲地以全力進攻蘇聯，莫斯科已陷於危境中了。但無論如何，蘇聯還未從政治舞台上退出去。保衛第一個工人國家仍是每個前進戰士之迫切的任務。因此，這本小冊子之出版，不但不會表示過時，反而更表示其迫切的意義了。

劉綺英

十月二十五日於孤島

目錄

序言

總論

- 一 蘇聯與過渡時期諸問題……………一
 - 二 蘇聯和帝國主義戰爭……………六
 - 三 第二次大戰與保衛蘇聯……………八
 - 四 給蘇聯工人的一封信……………一五
- 蘇聯的性質……………二〇
- 一 十月革命之歷史的意義……………二〇
 - 二 過渡社會……………二三

- 三 蘇聯的定義……………二四
- 四 蘇聯是工人國家嗎？……………二五
- 五 「反革命的工人國家」……………二六

史大林與蘇聯……………二八

- 一 史大林因何勝利……………二八
- 二 官僚層是一個階級嗎？……………三二
- 三 和平地移去官僚層是可能的嗎？……………三六

蘇聯往何處去？……………四一

- 一 蘇聯的性質尙未爲歷史所決定……………四一
- 二 倘若戰爭發生時蘇聯將如何？……………四三
- 三 新革命之不可避免……………五〇

無條件保衛蘇聯……………五五

- 一 「無條件保衛蘇聯」……………五五
- 二 中俄衝突與保衛蘇聯……………六一
- 三 蘇波戰爭與保衛蘇聯……………六三
- 四 芬蘇戰爭與保衛蘇聯……………七一
- 五 基本規則……………七二
- 六 帝國主義國家工人怎樣援助蘇聯？……………七三
- 七 誰保護蘇聯，誰幫助希特拉？……………七四
- 八 我們有權對革命抱樂觀……………八三

總論

一 蘇聯與過渡時期諸問題

蘇聯以一個工人國家的資格從十月革命中浮現出來。生產手段的國有，乃是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個必需的前提條件，牠已開展了生產力迅速增長的可能性。但同時這個工人國家的機關却經歷了激頭激尾的墮落；牠由一種工人階級的武器，變成爲一種反對工人階級底官僚暴力的武器，而且愈來愈成爲一種對國家經濟怠工的武器了。一個落後和孤立底工人國家的官僚化以及官僚之轉成爲一個全能的特權等級——這不僅在理論上此刻就是在實際上，也是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這個理論之最有力的反駁了。

蘇聯就這樣地包含着可怕的矛盾。但牠仍舊是一個墮落了^的工人國家。這是一種社會性的診斷。至於政治性的診斷則具有一種徘徊歧路的性質：或者是官僚制度愈來愈成爲世界資產階級在工人國家中的一個機關，牠將推翻財產的新形式且把國家推回到資本主義；或者工人階級將摧毀官僚制度，向社會主義前進。

在第四國際的支部看來，莫斯科審判案之發生毫不足奇且並不把牠當做克里木宮中獨裁者個人瘋狂的結果，而把牠當做特爾米多的合法的苗裔。牠們是從蘇維埃官僚內部底不可忍受的衝突中生長出來的，而這些衝突又反映出官僚與人民間的矛盾，以及『人民』自己當

正在加深的矛盾。這些審判案底流血的『瘋狂』性質，可以測度那些矛盾底緊張性，同時由此也可以預知那個大結局的行將到來。

那些拒絕回莫斯科底前任克里木宮外交代表的公開宣言，已用他們的方法，無可辯駁地證明了在官僚中已發現了一切政治思想的形態：由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埃乃斯·萊士）以至十足的法西斯主義（F·布田科）。官僚內部的革命分子只是極小的少數，他們消極地反映無產階級底社會主義的利益。不斷生長的法西斯反革命分子以更大的堅持性來表現世界帝國主義的利益。這些準備充當買辦角色的候補人的見解，並不是毫無理由的。他們認為新的統治層只有在同化於『西方文明』，即資本主義的名義之下拋棄國有化，集體化和對外貿易獨佔權，才能保障他們的特權地位。在這二極之間還有一些中間的散漫的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自由派的傾向，這些傾向都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為歸趨。

在這個所謂『無階級』社會的下層裏，毫無問題的也有極類似於官僚底分派的小集團存在，只不過表現得較為和緩且其對比也相反：自覺的資本主義傾向主要的還是指集體農場中興旺的一部分，而且也只是占人口中之極小的少數，但這一階層却具有廣大基礎，足以培養那種使大家窮困而積蓄個人財富的小資產階級傾向，而且牠還是得到官僚的自覺的鼓勵。

高踞於那個愈來愈擾亂社會平衡底高度矛盾的制度之上的特爾米多寡頭貴族，現在主要的已縮成如史太林的拿破侖主義的集團，牠以恐怖主義的辦法來句延殘喘。最近的司法的羅織，其目的在打擊左派。這當然也在清除右派反對派的領袖，因為舊布爾什維克黨的右派集團，從官僚的利益及傾向的觀點上看來，也代表一種左的危險。拿破侖主義的集團為自存計

，同特又因為害怕牠自己的『布田科』之流的右派同盟者，便迫得把老布爾什維克的一整代，幾乎一個不留的殺掉，這一事實不可辯駁地證明群眾底革命傳統的活力，同時也證明他們的總長增高的不滿。

蘇聯的『托洛斯基主義』

西歐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昨天還把莫斯科的審判案驗明為毫無攙雜的純金，今天又堅執的反覆說明在蘇聯內部既沒有托洛斯基主義也沒有托洛斯基派。但他們却無法解釋何以每次政黨都在那一面雖然與這種危險鬥爭的旗幟底下執行。假如我們把『托洛斯基主義』當作一個已完成的綱領，或甚而當作一個組織來考察，那末毫無疑義的，『托洛斯基主義』現在在蘇聯是極端微弱的。但牠之有牢不可破的力量，就是因為他不僅表現革命的傳統，同時還表現俄國工人階級底真正的反對態度。工人反官僚所積聚的社會仇恨——這顯然就是從克里木宮方面的觀點看來，構成了『托洛斯基主義』的。牠帶着極厲害的而確有根據的畏懼心理，害怕工人底深刻而模糊的不滿，與第四國際組織發生連繫。

老布爾什維克一代的處死，以及中年和青年一代底革命代表的處死，把政治鐘擺更擺向右面，擺向官僚中的資產階級派及其全國的同盟者方面去。我們可以想見他們，即右派，將在下一時期以更大的決心，設法改變蘇聯的社會主義性質，同時使牠更近於法西斯形式底『西方文明』的模樣。

從這個前途出發，則『保衛蘇聯』的問題便得到了具體的解答。假如明天資產階級法西斯蒂派，『布田科派』，好比說，想奪取政權，那末『萊士派』就不可避免的要列陣於巷戰防禦物的反對方面。雖則牠或許暫時的和史太林聯盟，但牠却不是保衛拿破侖主義的集團而是保衛蘇聯社會的基礎，即，那一份從資本家那裏奪來而變為國有的財產。假如『布田科派』確實與希特勒聯盟，那末『萊士派』將在國內和全世界範圍內保衛蘇聯以抵抗軍事干涉。除此以外任何路線都是一種叛賣的路線。

主要任務

這樣說來，在嚴格規定的例子中，雖不可事先否認有和官僚中特爾米多的部分建立『聯合戰線』以抵抗資本主義反革命公開進攻的可能性，但在蘇聯的主要政治任務，還是在推翻這個同一的特爾米多官僚。牠的統治增加一天，則經濟中底社會主義成分的基礎便多一天腐蝕，並增加資本主義復辟的機會。共產國際正因為走上這個方向，牠在絞殺西班牙革命以及敗壞國際無產階級的行爲中，充當了史太林主義集團的代理人及同謀者。

正如在法西斯國家一樣，官僚的主要力量並不在牠本身而是在羣衆的失望以及他們之缺乏一個新的遠景。史太林的政治機關，除了來得更無管束的蠻幹外，牠與那些法西斯國家並無什麼不同，因此，正如在法西斯國家一樣，今天在蘇聯所能做的，也只是準備的宣傳工作而已。又正如在法西斯國家一樣，將來多分要由國外事變來推動蘇聯工人的革命蜂起。在全

世界範圍內，革命分子反對共產國際的鬥爭，今天已是史太林派獨裁鬥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有許多陰兆已經預示出來，因為共產國際在格柏烏中沒有直接的基礎，所以牠的場合將在拿破侖主義集團以及整個特爾米多官僚制度場合之前。

×

×

×

×

蘇聯革命底新的高漲，將無疑的在反社會不平等和反政治壓迫底鬥爭的旗幟下開展。打倒官僚的特權！打倒史達哈諾夫運動！打倒蘇維埃貴族及其等級！給一切勞動形式以更大的工資平等！

爭取工會及工廠委員會的自由，爭取集會權利和出版自由，這種鬥爭將在爭取恢復和發展蘇維埃民主的鬥爭中展開。

蘇聯官僚以希特勒和戈培爾式普選權的虛構，來代替蘇維埃這個階級機關。現在必需給蘇維埃恢復起來的，不僅是牠們底自由的民主形式，而且還是牠們的階級內容。既然過去會禁止資產階級及富農參加蘇維埃，那末現在就必需把官僚及新興貴族逐出蘇維埃。在蘇維埃內只有工人，集體農場下級職員，農民及紅軍兵士的位置。

如果不給蘇維埃中的各個政黨合法化，那就不能使蘇維埃民主化。工農將由他們自己的自由投票，來表明他們所承認的蘇維埃政黨是那些政黨。

根據生產者及消費者的利益，從上到下的，把計劃經濟加以修正！工廠委員會應恢復監

督生產的權利。根據民主方法組織起來的消費合作社，應監督生產產品的品質及價格。

按照參加集體農場底工人的志願和利益，改組集體農場！

官僚底反動的國際政策，應代之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政策。公布克里木宮的全部外交情報。打倒秘密外交！

特爾米多官僚導演的一切政治審判案，在完全公開以及討論底坦白無私的光輝之下，重新審定。只有被壓迫衆羣底勝利的革命暴動，才能恢復蘇維埃政制以及保障牠向社會主義更進一步的發展。現在只有一個黨能夠領導蘇維埃衆羣暴動，這個黨就是第四國際的黨！

打倒該隱（聖經上殺弟的人——譯者）——史太林的官僚匪黨！

蘇維埃民主萬歲！

國際社會主義革命萬歲！

一九三八年九月

——摘譯自『過渡綱領』，中文譯名『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道路』

二 蘇聯和帝國主義戰爭

從歷史的範圍來說，世界帝國主義和蘇聯的對立，比資本主義國家本身間的對立是無比的要深得多。但由於工人國家的演化及許多其他的條件，工人國家和資本國家的階級矛盾的尖

銳性改變了。蘇維埃官僚主義之離奇的發展及勞苦群衆艱難的生存條件，極度的減少了蘇聯對國際勞工階級的吸收力。共產國際的嚴重的失敗及蘇維埃政府的民族和平主義的對外政策，只有更進而減少世界資產階級的恐懼。最後帝國主義世界內部矛盾之新的尖銳化，迫使歐美政府接近蘇聯，牠們在這個階段接近蘇聯，不是從原則的問題出發；即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而是從帝國主義列強爭鬪中的一時的作用出發。不侵犯公約，承認蘇聯等，就是這個國際形勢的表現。希特勒不斷的努力想指出『東部危險』的方法使德國的重整軍備合法化，但到現在尚未得到同情，——特別是從法國及其周圍的與國方面，這正因為雖有可怕的經濟危機，但共產主義的危險已失去了尖銳性。所以蘇聯外交的成功正表示——至少是一半——國際革命的極度削弱。

但是如果認為武裝進攻蘇聯已經完全過去，那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即使一時的關係減少了尖銳性，但社會制度的矛盾仍舊存在。資本主義的繼續衰落將迫使資產階級政府走上激烈的道路。每一個大的戰爭，不管牠的最初動機是怎樣，會明白的提出軍事干涉蘇聯的同意，爲的其灌輸新鮮的血液到資本主義的血管裏去。

不論這一衝突的條件及直接原因是什麼，保衛蘇聯，反抗資本主義對牠的攻擊，是每個忠實的勞動階級組織之基本的和迫切的義務。

一九三四年

——摘譯自『第四國際與戰爭』

三 第二次大戰與保衛蘇聯

此次戰爭與保衛蘇聯

史太林與希特勒聯盟揭開了世界大戰之幕，直接致使波蘭民族受人奴役；這個聯盟是起於蘇聯底柔弱及克林姆宮害怕德國。蘇聯柔弱底責任，正該那個克林姆宮擔負的：牠的內政在統治層和民衆之間劃下一道鴻溝，牠的外交爲着史太林派系利益而犧牲了世界革命利益。

東波蘭底佔領——那是與希特勒聯盟的一個報酬，也是防備希特勒的一個保障——接着來了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半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的財產之收歸國有。非此，克林姆宮就不能將被佔領的領土併入蘇聯版圖內了。那個被窒息的和被褻瀆的十月革命，以此表明牠還在活着。

在芬蘭，克林姆宮則不能完成這樣一個社會革命。帝國主義動員了世界輿論來「保衛芬蘭」，英法二國以直接干涉來威嚇，希特拉也不耐久等，他要在英法軍隊未出現於斯堪的那維亞半島之前奪取丹麥和挪威，——這一切都迫使克林姆宮不得不放棄將芬蘭蘇維埃化的工作，而祇限於奪取若干不可少的戰略要地。

侵略芬蘭，無疑問題地引起了蘇維埃普通人民深刻的反對。然而前進的工人明白，克林姆

宮寡頭政治底罪惡，並不會將蘇聯存在問題排出於議事日程之外。蘇聯在世界戰爭之失敗，不僅表示極權的官僚政治被推翻了，而且表示新的財產形式被取消，計劃經濟底第一次試驗大失敗，而全國變成了殖民地，即是說全國巨大的天然財富將交付於帝國主義之手，讓帝國主義有喘息的機會，至於第三次世界戰爭。無論蘇聯民衆或世界勞動階級，都不願有此結果。

芬蘭底抵抗蘇聯，無論如何英勇，同後來挪威底抵抗一般，都不是什麼獨立的民族自衛的。赫辛基政府自己也明白此點，所以牠寧可屈服於蘇聯，而不願將芬蘭轉變爲英法二國軍事根據地。我們誠心承認每個民族都有自決之權，但這並不改變此事實，即：在此次戰爭過程中這個權利是沒有什麼重量的。我們必須依照基本的因素來決定我們的政策底基本路線，而非依照第十等的因素。第四國際那個提綱說：「民族自衛觀念，尤其恰與保衛民主觀念相一致時候，最能被人利用去欺騙中立小國底工人（瑞士，相當限度下比利士，斯堪的那維亞諸國……）：惟有小資產階級蠢才（如勞勃·格臨），從瑞士底偏僻鄉村出來的，才能認真相信：他將捲入的世界戰爭乃是保衛瑞士獨立底一個手段。」這幾句話今日含有特別的意義。那些自命爲革命的小資產者，以爲可以根據紅軍攻入芬蘭這類零星上細節來決定無產階級在保衛蘇聯問題上的戰略路線——他們實在并不比瑞士底社會愛國派勞勃·格臨高明得多少！

世界資產階級關於蘇芬戰爭所進行的宣傳，是異常之雄辯的。意見既然一致，義憤又復填胸。此舉以前，克林姆宮底背信和殘暴，都未曾激起資產階級底義憤，因爲全部世界政治史正是以背信和殘暴寫成的。資產階級底恐懼和義憤，是爲了芬蘭將實行那種社會革命，如紅軍在東波蘭所實行的。這中間對於資本主義財產制，含有一個新的威嚇。反蘇聯運動激頭

澈尾帶有階級性，這回又加一次揭露了：由於十月革命立下的社會基礎——最後分析起來，官僚層底存在正依賴於這個基礎——蘇聯仍舊是一個工人國家，使得全世界資產階級害怕。資產階級和蘇聯間那些插話性的協定，並不改變這個事實，即：『從歷史範圍說，世界帝國主義和蘇聯間的矛盾，比較各個資本主義國家間相互的對立，是無限地深刻得多了。』（『第四國際與戰爭』）

好多小資產階級激進派，昨天還在把蘇聯當作軸心。以此團結『民主的』勢力來反對法西斯，如今則忽然發現：牠們自己的祖國受了希特拉威脅時候，莫斯科並不來援救他們，反而採取一種帝國主義政策，蘇聯和法西斯國家之間是沒有什麼差別的了。

每個有階級覺悟的工人一定要回答說：胡說！這中間是有差別的。資產階級認識這個社會差別，比那些激進的饒舌者認識得更加清楚而深刻。自然，一個國家，尤其一個落後國家，生產機關之收歸國有，並不足以保證建設社會主義，但已能夠助長社會主義底初步前提了，——那就是依照計劃發展生產力。若因生產機關收歸國有，本身並不能使羣衆生活舒服，而看不起牠，那就等於以無牆壁無屋頂不能居住爲理由去主張破壞那個岩石的屋基一般。有階級覺悟的工人，明白，若不保衛已得的勝利品，則完全解放之鬥爭便無成功希望，無論那些勝利品是如何微不足道的，所以我們更加應該保衛計劃經濟那樣一個如此巨大的勝利品以防止資本主義關係之復辟，凡不能保衛舊陣地的人，就永遠爭取不到新的陣地。

第四國際祇能以革命的階級鬥爭手段來保衛蘇聯。教工人去正確瞭解國家——帝國主義國家，殖民地國家，工人國家——底階級性，其相互間的關係，及每一國家底內部矛盾以此

使得工人能夠於每個已定局勢之中做出正確的實際結論。第四國際一面不倦地進行反對莫斯科寡頭政治的鬥爭，一面又堅決地排斥任何足以幫助帝國主義反對蘇聯的政策。

保衛蘇聯，在原則上是與準備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相一致的。我們乾脆排斥一國建立社會主義的理論。排斥無知的和反動的史大林主義那個精神產兒。惟有世界革命才能救護蘇聯爲社會主義之用。但世界革命必然連帶着傾覆克林姆宮底寡頭政治呀！

打倒史太林私黨！

拍了『民主國』五年馬屁之後，克林姆宮竟與希特勒聯盟，幫助他奴役了波蘭民族，以此無恥地輕蔑世界無產階級；克林姆宮侵入芬蘭之前以無恥的『沙文主義』誇下大口，以後的戰爭中又暴露同樣無恥的軍事無能；克林姆宮大言不慚允許『解放』芬蘭人民不受資本家剝削，隨後又卑鄙地屈服於希特勒面前：——這以上便是史太林政制在歷史底危急時機所表現的本領了。

莫斯科幾次審判已經揭破了：極權的寡頭政治早已變成國家發展路上一個絕對的障礙物了。經濟生活一天比一天更複雜的需要，其日益提高的水準再不能容忍着官僚底壓制了。然而那羣寄生蟲並不準備讓步。爲了保持自己地位，他們毀滅了國中每最好的事物。他們切莫以爲十二年間做了三次革命的人民忽然變成愚蠢了。這些人民受了壓制，迷了方向，但觀望着，思索着。官僚政治，以其任性的統治，壓迫，貪婪和血腥氣與報復，使人每日記起了

牠的存在。半飢餓的工人和集體農場的農民，帶着仇恨低聲互訴那些營養的委員老爺狂奔極慾的生活。爲了史太林底六十週歲，烏拉爾區工人們不得不做一年半的苦工來製造一尊可恨的『人民之父』底大像，一尊寶石製成的大像——這是古代波斯克西士王或埃及克雷奧帕特拉后一流人做的事情。一個政制能縱容如此醜惡不堪的事情，是不會不激發群眾底仇恨的。

外交政策對應於內國政策。克林姆宮政府若是代表工人國家底真正利益，共產國際若是替世界革命服務，則芬蘭小國底民衆一定要歸向於蘇聯，紅軍底侵入如果不是不必要的，便是立刻要得芬蘭民衆歡迎，視爲一種革命的解放事業。可是克林姆宮過去的全部政策，使得芬蘭工人和農民厭棄了蘇聯。希特勒侵略中立國時遠能期望得到所謂『第五縱隊』底內應，至於史太林，則他在芬蘭得不到任何援助，雖然那裏有一九一八年暴動底傳統，芬蘭共產黨也有很長久的歷史。在這些條件底下，紅軍之侵入就帶直接的和公開的軍事強暴底性質。這一個強暴底責任完完全全應歸莫斯科寡頭政治担負的。

戰爭是某一政制底酸性檢驗。第一期戰爭底結果，蘇聯底國際地位已經顯然低落了，雖然得到一些是供擺設廚窗的成功。克林姆宮底外交政策使得世界勞動階級和被壓迫民族之中很廣大的一部分厭棄了蘇聯。莫斯科奪取來之戰略要地，在世界勢力衝突中僅居第三等因素。德國所得的則是波蘭最重要的和最工業化的部分，德國從此與蘇聯有共同疆界了，即開了一道門通向東方去。德國經過斯堪的那維亞半島支配了波羅的海，將芬蘭灣變爲一個塞緊的瓶子。受痛苦的芬蘭落入希特勒直接操縱之下了。列寧格拉邊境外面，以前是些中立的弱國，如今則爲強大的德國了。被史太林斬了頭的紅軍，已向全世界表明牠的柔弱。聯蘇內部民

族主義的離心傾向也日漸濃厚了。克林姆宮領導機關底威望趨於低落。西邊的德國和東邊的日本，現在比在克林姆宮底芬蘭冒險以前，更覺得無限地更有把握得多。

史太林在他那貧乏的腹筒之中祇能找到一個辦法，來回答事變之不祥的警告：他撤換了伏洛希洛夫而代之以一個更無用的飯桶，鐵木先珂。凡遇這類事情，他的處置之目的總是要將人民和軍隊底氣憤從負責任的主犯移開去，并安置一個人爲軍隊底主帥，他的無能保證了他的忠實。克林姆宮又加一次暴露那裏是失敗主義底中心巢穴了。惟有搗毀這巢穴才能保障蘇聯底安全。

準備以革命手段推翻莫斯科的統治派系，這乃是第四國際主要任務之一。這個任務既非簡單，也不容易。他需要英勇和犧牲。然而人類走上的這個大動亂時代，將一下又一下打擊克林姆宮寡頭政治的，將擊破他的極權機構的，將喚起勞動群眾自覺心的，因之亦將促進第四國際蘇聯支部的建立的。事變將使利于我們，倘若我們能够扶助事變進展的話！

第三國際與戰爭

墮落的第三國際底政策——粗俗的機會主義和放蕩的冒險主義之混合物——其對於勞動階級的惡影響更甚於牠的哥哥第二國際底政策。革命的黨應建立其整個政策於工人底階級自覺之上，共產國際則忙着沾污和毒害這個階級自覺。

互相作戰的兩個陣營，其御用的宣傳家各自暴露對方底罪惡，有時也是完全說對的。戈

培爾說了許多真話。關於英國在印度的殘暴。英法二國報紙也說了許多內情關於希特勒和史太林底外交政策。然而這種方面的宣傳，本身就是最有毒的沙文主義毒藥。半真半假的話是一切說謊之中最危險的。

共產國際現在的宣傳，全部屬於此類。共產國際拍了民主國五年無聊的馬屁，在這期間，『共產主義』整個地僅成爲對於法西斯侵略者單調的攻擊之別名；以後，一九三九年秋天，牠忽然發現西歐民主國底罪惡深重的帝國主義了。——向左轉！從此以後沒有一個字譴責捷克和波蘭之被吞併，丹麥和挪威之被奪取，以及希特勒手下匪徒施於波蘭人和猶太人之可怕的野蠻殘暴！希特勒被說做了一個愛和平的索食者，不斷受了西歐帝國主義所激惱。英法聯盟，在共產國際刊物中，是被稱爲『帝國主義聯合反對德國民衆』的。戈培爾自己還說不出這話哩！亡命國外的德國共產黨燃起了愛祖國的火焰。德國祖國既然仍是法西斯的，那麼德國共產黨就是站在一個社會法西斯立場了。終於到了時候，讓史太林底社會法西斯理論具備了血肉之軀。

驟然看來，共產國際英法兩支部底行徑，似乎剛剛相反的。與德國支部不同，這兩支部不得不攻擊自己的政府。但這個忽然的失敗主義却並非國際主義，而是愛國主義底一個變種，——那些老爺認爲他們的祖國乃是他們的福利所依賴的克林姆宮。法國史太林派有好多人受迫害時無疑表現了勇敢。但這個勇敢底政治內容，被他們的掩飾敵國劫掠政策所沾污了。法國工人對此應有什麼感想呢？

革命的國際主義者總歸要被反動派稱爲敵國奸細的。共產國際替牠的英法兩支部造成了一種局面。讓反動派有理由如是控告他們，因之迫得工人走入愛國主義陣營，或者糊塗和消極。

克林姆宮底政策是簡單的：他將共產國際連同油和錳一起賣給希特勒了。但是那些人物狗一般的服從，自己甘心受人出賣，也就不可否認地證明了共產國際內部的腐朽。克林姆宮諸走狗再沒有甚麼原則，甚麼榮譽，甚麼良心了，——有之祇是一根軟脊柱。但是生着一根軟脊柱的人永遠不會領導革命的。

史太林與希特勒的友誼不會永矢勿替的。也不會維持長久。我們這篇宣言到羣衆之手時，克林姆宮底外交政策也許已有新的轉變。在此情形之下，共產國際宣傳底性質也要改變。如果克林姆宮去親近民主國，那麼共產國際又要從他的堆棧裏尋出記載國社黨罪惡的褐皮書來了。但這並不是說，他的宣傳帶着了一種革命的性質。商標換了，但他仍舊是奴顏婢膝的，同以前一樣。革命的政策要求首先拿實話告訴羣衆。但是共產國際有系統地說謊。我們向着全世界勞動者說：不要信說謊者底話呀！

一九四零年五月

——摘譯自『第四國際緊急大會宣言』

四 給蘇聯工人的一封信

我謹向蘇聯工人，集體農場農民，紅軍兵士與紅色海軍的水兵們致敬！這敬禮是我從遼遠的墨西哥致送給你們的，自從史太林私黨將我放逐至土耳其，自從資產階級將我從這一國驅逐到那一國之後，我現在避居於此！

親愛的同志們！很久以來，史太林的說謊的刊物，在一切問題上都欺騙你們，關於我本人以及我之政治上的同志們的事情，他們也欺騙你們。你們沒有工人的刊物；你們所讀的只有官僚們的報章，這些報章只是有系統地造謠，以便讓你們陷於黑暗中，並因此謀得特權寄生階層的統治的穩固。

凡是胆敢提高聲音來反對那萬人仇恨的官僚制度的，都被稱做「托洛斯基主義者」，外國奸細；昨天稱爲德國間探，今天則稱爲英法偵探，然後就給送去槍斃。好幾萬革命戰士已經在格柏烏的槍口，在蘇聯內外，特別是西班牙的毛瑟槍之顛倒下。他們都被描寫成法西斯主義的奸細。別相信這個可惡的誣蔑啊！他們的罪狀是在於保衛工農，反對官僚的野蠻與貪婪。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全體老衛士，列寧的所有同事與助手，十月革命的全體戰士，內戰中的全體英雄，都已經給史太林屠殺了。在歷史的記錄中，史太林的名字將永遠以該隱（聖經上的殺弟者——譯者）這個不名譽的名字記述下來！

革命不是爲官僚們幹的

我們之所以要完成十月革命是爲了勞動者，不是爲了新的寄生蟲。但是因爲世界革命之

延遲，因爲俄國工人們，特別是俄國農民的疲倦，以及在很大範圍內，也由於他們的落後，所以在蘇維埃共和國裏，升起了一個反對人民的，壓迫的寄生階層，他的領袖就是史太林。過去的布爾塞維克黨，變成爲這一階層的機關。過去曾經是共產國際的那個世界組織，今天已是莫斯科寡頭們的一個柔順的工具了。工農蘇維埃久已死亡。他們已經讓墮落的委員們，書記們及格柏烏的密探們所代替了。

不過，在十月革命殘存的勝利品中，國有化的工業與集體化的蘇維埃經濟，幸而還在。在這個基礎上，工人的蘇維埃能够建設一個新的與較爲幸福的社會。這個基礎，我們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能讓渡給世界資產階級。革命者的義務在於用牙與爪來保衛工人階級的每一個既得陣地，不管他是關於民主權利，工資標準，或關於像生產工具國有與計劃經濟那樣偉大的人類勝利品。凡是不能保衛既得勝利的人，那是永遠不能爲新的勝利品而戰鬥的。反對着帝國主義敵人，我們將用全力來保衛蘇聯。不過蘇聯人民假使不能保當年對付沙皇官僚與資產階級那樣地對付史太林官僚，那末十月革命的勝利品是不會替人民服務的。

史太林在危害着蘇聯

假使蘇維埃經濟生活曾經爲人民的利益而進行；假使官僚們不會吞沒與空耗了國民收入的大部分；假使官僚們不會把民衆的主要利益踐踏在脚下，那麼蘇聯就該是一個偉大的磁極，吸引着世界勞動者，而蘇聯之不可侵犯則是確有保證的了。然而史太林這個不名譽的制度

使蘇聯失去了這個吸引力。當與芬蘭作戰時，不僅大多數芬蘭農民，而且大多數的芬蘭工人，也都站在他們的資產階級一邊。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他們知道鄰近列寧格勒的與蘇聯的工人所受自史大林官僚的那種空前的壓迫。這樣看來，對內吸血與殘忍，對帝國主義仇敵如此懦怯的史大林官僚，成為蘇聯戰爭危險之主要來源。

老的布爾喬維克黨與第三國際已經分別瓦解了。忠實與前進的革命者已在國外組成了第四國際，他的支部已遍設在世界大多數的國家中。我是這新國際的一員。當我參加於這一工作時，我還是站在這同一旗幟之下，這旗幟在一九一七年與內戰的幾年中，曾使我和你們，或你們的父親與長兄們為之爭鬥的；也就是在這一旗幟之下，我們跟列寧一起建設了蘇維埃國家與紅軍的。

第四國際的目標

第四國際的目標是要擴六十月革命到全世界，同時又要清除蘇聯的寄生官僚，藉以復興蘇聯。要達到這個目標，只有一條道路；即工人，農民，紅軍兵士，紅色水兵起來反對新的壓迫者與寄生蟲階層。要準備這個暴動，需有一個新黨——一個前進工人的勇敢與忠實的革命組織。第四國際認為在蘇聯建設這樣的一個黨，乃是牠的任務。

前進的工人們！你們要爭先團聚於馬克思與列寧的旗幟——如今已成爲第四國際的旗幟——之下，學習着在史林大制度的非法狀態中，怎樣創立嚴密的與可靠的革命組織，學習着

經過忠實與可靠的人，特別是水兵們，與你們在資產階級國家中的革命同志建立關係！這是困難的，但是可以辦到的。

目前的戰爭時愈加擴大，正在累積着破壞，在滋生着更多的悲愁，失望與抗議，他正在驅令世界走向一個新的革命爆發。世界革命將用新的勇氣與堅毅來再度鼓勵蘇維埃的勞動階級，將拆毀史大林階層的官僚支持。我們必須用堅定的有系統的革命工作來準備這一時間。我們國家的命運，我們人民的未來，我們兒孫們的命運都注視之一擲了。

打倒該隱史大林及其洩黨！

打倒貪婪的官僚制度！

勞動者的堡壘——蘇聯萬歲！

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萬歲！

你們的兄弟

里昂·托洛斯基

X

X

X

X

警告！史大林的刊物一定會就這封信自由「帝國主義的奸細」傳入蘇聯的。我預先警告：這是一個謊騙。此信將藉一些準備為社會主義事業冒生命危險的可靠革命家之手，傳入蘇聯。他們將抄寫牠，並加以極廣大的傳佈——托。

一九四〇年

——譯自美國「社會呼聲報」

蘇聯的性質

一 十月革命之歷史的意義

因為俄國資產階級之微弱無力，使落後的俄國之一切民主的任務，如掃除君主專制，消滅半封建的農奴制度等，只得經過無產階級專政來完成。可是無產階級既領導了農民群眾取得了政權，便不能停止在這些民主任務的完成之上。資產階級的革命，是直接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初步階段聯系起來的。這種事實，並不是偶然的。最近幾十年的歷史，已表現得非常明白，在資本主義日趨衰亡的情形之下，一切落後的國家，是不能達到那些老的資本主義國家所已達到的水平的。那些高度發展的文明國家，自己既走到死路以後，便阻礙那些正在向文明進展的國家。俄國之所以走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並不是因為牠的經濟是第一個成熟到能夠實行社會主義的轉變，而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之上，牠再不能向前發展了。要想把俄國從野蠻狀況之下解救出來，則生產工具收歸社會公有，已經變成必須的條件了。這就是適用於落後國家『配合發展的規律』。這過去的沙皇帝國，如列寧所說是『資本主義最弱的一環』，牠雖達到了社會主義的革命，但到現世，革命了十九年之後，牠的當前任務仍然是如列寧所說的『趕上並超過』歐美國家（第一步自然是趕上牠們）。這就是說，牠還必須去

解決技術與生產力的問題，這些問題，在先進國家是早已解決了的。

除此以外，還有別的辦法嗎？推翻了舊的統治階級，並沒有解決了脫離野蠻狀況達到文明境地的任務，只不過把這種任務完全提出來而已。同時，革命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於國家之手，才使一種新的而且無比的更有效的工業方法，得以實行。只因爲有了有計劃的指導，才能於那短短的時期當中，把帝國主義戰爭和國內戰爭所破壞的，完全恢復起來，並且建立許多偉大的新企業，開創新的生產門類，和設立新的工業部門。

世界革命發展之特別遲緩（當時布爾雪維克黨的領袖們，都計算世界革命急速起來援助的，給蘇聯造成了巨大的困難，但是也顯示了牠的內部力量和資源。不過要正確的估量所得到的成果（其宏大及其缺陷），只有藉助於國際範圍的衡量才是可能的。這本書（即『被背叛了的革命』——編者）是以一種歷史的和社會學的分析，來解釋蘇聯的進程，並不是一些統計材料的堆積。可是爲了以後討論的便利起見，也必須拿某一些重要的數字來做出發點。

這幾年來，蘇聯工業化的範圍之廣大，若以之與全資本主義世界的停滯和衰落對照起來，乃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下列巨大的指數，便指明這一點。德國的工業生產，只因爲狂熱的戰爭準備，現在才恢復到一九二九年的水平。英國的生產，在保護政策羽翼之下，最近六年當中，才提高了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美國的工業生產，減低了將近百分之二十五；而法國竟減低至百分之三十以上。在資本主義國家當中，佔第一位的是日本，牠因爲瘋狂的擴充軍備并搶奪牠的隣邦，牠的生產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就以這個例外的數字，來較諸蘇聯的飛快的發展，也是不足道的。蘇聯的工業生產，在這同一時期當中，增加了幾乎三倍半或百分之

二百二十五。重工業在近十年當中(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五年)加了十倍以上的生產。在五年計劃的第一年(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投下的資本，共達五十四萬萬盧布；但是一九三六年則為三百二十萬萬盧布。

如果認為盧布不穩定，不能拿來作為衡量的單位，那麼我們可以丟開這種貨幣的估計不算，來找另一種絕對無可爭辯的單位。一九一三年十二月，頓河流域所產出的煤共二百二十七萬五千噸；但是到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則為七百十二萬五千噸。最近三年來，鐵的生產增加了兩倍。鋼和鑛鐵廠的生產，增加將近兩倍半。煤油，煤和鐵的生產，較之戰前的數目，增加了三倍到三倍半。一九二〇年，當第一次電氣化的計劃草成之時，全國只有十個電站，共總只能產生二十五萬三千基羅瓦特的電力。但是到了一九三五年，已經有九十五個電站，其總的電力，則為四百三十四萬五千基羅瓦特。當一九二五年的時候，蘇聯的發電力，在世界上佔第十一位；但是一九三五年，則僅次於德國和美國。在煤的生產上，蘇聯從第十位進到第四位。在鋼的生產上，從第六位進到第三位。在拽引機的生產上，現在已跳到世界第一位的地步。在糖的生產上，也是如此。

凡此工業巨大的成功，前途有無限希望的農業的開始，舊的工業城市之非常的發展，及新的工業城市之建立，工人人數之迅速的增加，文化水準之提高及文化要求之增大，——這些都是十月革命之無可爭辯的果實，而舊世界的預言家們，曾認這次革命是人類文明之墳墓的。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我們也再沒有什麼可爭論的了。社會主義已經表現了牠有權利要求取得勝利，並不是在資本論的字句上，而是在佔地球面積六分之一的工業舞台上，不

是用辯証法的語言，而是用鋼，水門汀，和電氣的語言。假定蘇聯因內部的困難，外部的打擊，以及牠的領導者的錯誤而崩潰了(我們堅定希望不至發生這種事情)，那對於將來，也留下一個不可毀滅的事實，即因為無產階級的革命，就使一個落後的國家，在不到十年以內，竟得到歷史上空前的成功。

一九三六年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中文本譯名為『蘇聯的現狀及其前途』

二 過渡社會

馬克思把這個新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編者)的第一階段，叫作『低級共產主義』以別於『高級共產主義』，在『高級共產主義』之下，貧乏的最後陰影消失了，跟着物質的不平等也消失了。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常常被當作新社會的低級和高級而對照着說的。現在蘇聯御用理論家說：『我們自然還未達到完全的共產主義，但我們已經完成了社會主義，即已經達到了低級共產主義。』為證明這個，他們引證國家托拉斯在工業中，集體農場在農業中，國家商店和合作社在商業中，都佔着統治的地位。驟一看來，這好像與馬克思的先天的(因而是假定的)圖式，完全相符。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這個問題，不應該只從財產形式上去觀察，而不管勞動生產力達到何種程度。所謂『低級共產主義』，無論如何馬克

思是指這樣一個社會而說的：這個社會一開始，其經濟的發展便已經比最進步的資本主義爲高。從理論上說來，這種觀念是毫無瑕疵的，因爲以世界範圍來說，共產主義，縱然在最初的開始階段，其發展的水平，也要比資產階級社會爲高。此外，馬克思曾設想由法國人開始社會革命，德國人繼續牠，而英國則完成牠；至於俄國人，馬克思是把他擱在最後的。但是這個理想的次序，已爲事實所推翻了。現在誰要是機械的把馬克思這種世界歷史概念，應用到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蘇聯的特殊情況來，那他即刻又要爲許多矛盾所纏糾而不能解脫的。

俄國，在資本主義的世界中，本不是最強的一環，而是最弱的一環。現在的蘇聯，在經濟上，并不超過世界的水平，牠只是在全圖趕上資本主義的國家而已。假使馬克思把那種立基於當時最進步的資本主義之上，而且生產力已經社會化的社會，叫作『低級共產主義』，那麼這個名稱，很顯然的還不適用於蘇聯，因爲今日於蘇聯，在技術，文化和生活的享受上，還遠較資本主義國家爲低。所以就今日的蘇聯制度，包含牠的一切矛盾在內來說，與其稱爲社會主義的制度，毋寧稱爲一種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準備制度。

一九三六年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

三 蘇聯的定義

蘇聯乃是介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中間一個矛盾的社會；在這一社會裏，第一，生產力

還太低，不能給國有財產以社會主義的性質；第二，由貧乏造成的原始積累傾向，經過計劃經濟的無量數孔隙而洩露出來；第三，帶有資產階級的性質的分配規準，是托根於新的社會分化基礎之上；第四，經濟的發展，一面緩慢的改善了勞動者的地位，一面却推進了特權階層之迅速的形成；第五，一個官僚制度，利用社會的衝突，已經把牠自己轉變爲一種不受監督的集團而與社會主義相背馳；第六，被統治的黨所背叛的社會革命，仍然存在於財產關係上和勞動羣衆的意識上；第七，日益增長的社會矛盾，其繼續的發展，可以向前走到社會主義，也可以後退到資本主義；第八，在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反革命必須打破工人的抵抗才行；第九，在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工人們必須打倒官僚制度才行。最後分析起來，問題要決定於國際舞台之活的社會勢力的鬥爭。

一九三六年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

四 蘇聯是工人國家嗎？

蘇聯是工人國家嗎？蘇聯這個國家，是建立在無產階級革命所創立的財產關係之上，牠受着勞動官僚的統治，這統治是保護那新興特權階層的利益的。蘇聯雖然在等級上有了很大的分化，但牠還能稱爲一個工人的國家，這正猶之乎被機會主義者——即資本家走狗——所領導

與叛賣的職工會，也還能稱之爲工人組織一樣。革命者即使對於那完全給改良主義腐蝕了的職工會，也願意保護牠，不使受階級敵人的襲擊，但同時却絕不妥協地打擊那叛變的領袖；第四國際各黨對於蘇聯的態度也是如此，牠們保護蘇聯，不使牠受帝國主義的進攻，但同時一分鐘也不會放棄以對那反動的史太林機關的鬥爭。無論在戰時或平時，他們保持着批評蘇維埃統治層的完全自由，而且要有充分自由的權利，去反對他們犧牲了蘇聯與國際革命的利益與帝國主義者進行妥協。

一九三六年七月

——摘譯自『第四國際與蘇聯』

五 『反革命的工人國家』

我們假定匪黨把汽車駛過一條崎嶇道路，逃脫了警察的追捕，當一個機匠來檢查這一輛汽車，發現車駕彎曲了，車輪已不管事，摩托也損壞了一部分，他可以很有理由的說：『這不是一輛汽車——鬼才曉得牠是什麼東西！』像這樣的估計，沒有任何技術和科學的價值，但牠却表現這位機匠對那些匪黨勾當的正當的反感。但我們又假定這位機匠必須要修好這一件他名之爲『鬼才曉得牠是什麼東西』的東西。這時，他就先得承認擺在他前面的是一輛毀損了的汽車。爲了決定怎樣動工，他將斷定那些部分尚完好，又那些部分不用修理。一個有階級自覺的工人對蘇聯也採取同樣的態度。他有充分的權利說官僚的匪黨已把工人國家變成

『鬼才曉得牠是什麼的東西』。但當他經過這種反感的發洩而要解決政治問題時，他就迫得承認，擺在他前面的是一個毀損了的工人國家，在這個工人國家裏面經濟的摩托已毀損了，但牠仍繼續行駛，而且替換若干部分，她就能够重新被修理完好。當然，這只是一個類比。但牠却是值得考慮一下的。

有些聲音呼喊道：『假如我們仍舊承認蘇聯爲一個工人國家，我們就一定要建立一個新的範疇：反革命的工人國家。』這種論調是企圖用一個好的綱領式的標準，來對抗一種可憐的，卑鄙的，甚至是令人厭惡的現實，藉以震撼我們的想像。但我們不是從一九二三年起就天天在考究蘇維埃國家在國際角逐場上如何愈來愈盡一種反革命的作用麼？難道我們已忘記中國革命，英國一九二六年總罷工，以及最近西班牙革命的最新鮮教訓了麼？有兩個完全反革命的工人國際。這些批評家顯然忘記這個『範疇』。法、英、美及其他國家的工會完全擁護其自國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政策。這並不妨礙我們稱牠們爲工會，支持牠們底進步的措施，以及保衛牠以反對資產階級。爲什麼不能夠把同樣的方法應用於反革命的工人國家呢？最後的分析起來，一個工人國家是一個已獲取了政權的工會。在上述兩個場合中，態度的不同可由這一個簡單的事實來解釋，即，普通的工會有一個長期的歷史，我們已習慣於把牠們視爲現實，而不是簡單的視爲我們政綱中的一個『範疇』。但是關於工人國家，人們已表明無力學習把牠當作一個真正的歷史事實來處理，這個歷史事實並沒有隸屬於我們的政綱。

一九三九，十，十八

——摘譯自『再論蘇聯性質』

史太林與蘇聯

一 史太林因何勝利

十月革命之無產階級的性質，是決定於世界的情勢和國內的各種力量之特殊的相互關係。那時各個階級是在沙皇專制和落後的資本主義的野蠻環境之中形成的，決不是按照社會主義革命的要求而形成的。實際的情形是恰恰相反。正因為這個，所以在多方面都非常落後的無產階級，才能够於幾個月內，從半封建的君主專制跳到社會主義的專政，同時也正因為這個，所以牠的內部的反動是必然不可避免的。這種反動，發展成一串聯續的浪潮。而外部的狀況和事變則更加促成了牠。干涉之後又繼之以干涉。革命又沒有從西方得到直接的幫助。國家沒有達到所預期的繁榮，反而陷於長期的貧困。并且工人階級中的傑出的代表，不是在內戰中死亡，就是更上升幾步而脫離了羣衆。於是在極度的緊張，希望和幻想之後，就來了長時期的疲乏，消沉和對於革命結果之失望。「平民的驕矜」成了退潮，而上漲的乃是卑怯的心理和自利主義。新統治層就是在這種浪潮之上，達到了牠的地位。

五百萬紅軍之解散，對於官僚階層的形成，起了不小作用。打勝了仗回來的軍官們，在地方蘇維埃，教育機關和經濟機關中，都取得領導的地位，他們并且很頑強的把在內戰中保障勝利的制度運用到各方面。於是在各方面，羣衆就逐漸的被擠開，不能實際的參加領導國家的工作了。

無產階級內部的反動，使城鄉小資產階級各階層發生極大的希望和自信，他們的新生命本為新經濟政策所喚醒，現在愈發勇敢了。新的官僚層，在其初是以無產階級的代表而興起的，現在覺得牠自己是各階級之間的仲裁法庭了。牠的獨立性於是日益增加。

國際的情勢也以極大的力量向這同一方向推進。世界無產階級所受打擊愈大，則蘇維埃的官僚愈益有自心力。在這兩件事之間，不僅有一種年代的聯系，而且有一種因果的聯系，這關係向兩方面工作。官僚主義的領袖們促進了無產階級的失敗，而無產階級的失敗又促進官僚們上升。一九二三年保加利亞暴動失敗，和德國工人階級的政黨之不名譽的退却，一九二四年愛沙尼亞暴動企圖之瓦解，一九二六年英國總罷工之遭受背叛，和波蘭工人階級政黨在畢爾蘇斯基就任時之可恥的行爲，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之慘遭屠殺，而最後，德奧兩國工人最近之更不祥的失敗，——這些歷史上的大災禍，消滅了蘇聯羣衆對於世界革命之信心，并且使官僚層愈向上昇而成爲他們心目中唯一的救星。

至於這十三年以內世界無產階級失敗之原因，著者必須請讀者去讀他的其他的著作；在那些著作之中，他曾經揭發克里姆林宮的領袖們之致使革命破產的作用，他們在各國革命運動之中，是完全脫離了羣衆并且非常的保守。但在這裏我們只想注意這一無可辯駁的富於教訓的事實：在歐洲和在亞洲的革命之不斷的失敗，雖然削弱蘇聯的國際地位，却大大加強了蘇維埃官僚層。在這一串歷史事變之中，有兩個時期是特別有意義的。一九二三年下半年，

蘇聯工人以最大的熱忱注意了德國，因為那裏的無產階級似乎已經有奪取政權之勢。但德國共產黨之張皇失措的退却，給了蘇聯勞動羣衆以最大的失望。而蘇聯的官僚也就立刻向『不斷革命論』進攻，給左派反對派第一次殘酷的打擊。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之間，蘇聯的人民又感着一種新的希望。大家的眼睛都注意到東方，中國革命運動正在突飛猛進的發展。左派反對派從上次打擊之下恢復過來，並且得到大批新信徒。但一九二七年底，中國革命又慘遭……屠殺，共產國際簡直是出賣了中國工農。於是一種失望的冷潮重新淹沒了蘇聯的羣衆。官僚們在報紙上和在會議中，對於左派反對派肆行攻擊以後，終於在一九二八年下手整批的逮捕我們了。

固然不錯，有幾萬革命戰士團聚在布爾塞維克列甯派的旗幟週圍。前進的工人也無疑的同情於反對派，但是這種同情是消極的。羣衆不相信情勢可以由一個新的鬥爭而改變。同時官僚們却宣佈說：『爲着世界革命，反對派想把我們拉入一個革命戰爭之中。震動得够了啊！我們現在有權利休息一下。我們要在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信賴我們罷，信賴你們的領袖罷！』這種休息的福音，鞏固了官僚機關和軍政兩方面的官吏，並且無疑在疲乏了的工人之中得着應聲，尤其是在農民羣衆之中。他們自問道：反對派真要爲着『不斷革命』觀念犧牲蘇聯的利益嗎？實際上，鬥爭乃是關於蘇維埃國家的生存的利益。共產國際在德國的錯誤政策，結果在十年以後造成希特勒的勝利，即是說，造成從西方來的戰爭危險。而在中國的同樣錯誤的政策，加強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又招致東方的更迫近的危險。但一切反動時代之主要的特徵，就是缺乏勇敢的思想。

反對派孤立了。官僚們則趁熱打鐵，利用工人的迷惑和消極，使他們中間落後的階層起來反對先進的階層，而且愈發大胆的依靠與富農和一般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在幾年以內，官僚們就這樣粉碎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鋒隊。

如果以爲素不爲羣衆所知道的史太林，是突然一下夾着完滿的戰畧計劃而顯身出來的，那這種想法未免有點天真。事實絕不是這樣。史太林尋到他自己的道路以前，官僚們先尋到史太林。他帶給他們以一切必須保證：一個老布爾塞維克的聲望，倔強的性格，狹小的眼光，而他的勢力的一源泉，又是與政治機關之密切的聯系。勝利之落在史太林身上，當初連他自己也覺得驚奇的。這勝利是新的統治集團對於他的友誼的歡迎，這集團想拋棄革命的原則和免除羣衆的監督，而在牠自身內部的事務上，又需要一個可靠的仲裁者。史太林在羣衆面前和革命事變中本是第二等人物，如今成爲特爾米多派官僚之天然的領袖和第一個人物了。新統治層立刻就流露出自己的觀念，感情，最重要的還流露出自己的利益。現在官僚層之較老的一代，其絕大多數在十月革命之中，都是站在反動的營壘裏。（只拿蘇聯的駐外大使來說吧：杜洛雅諾夫斯基，馬易斯基，波丹金，蘇里茲，金丘克等都是如此。）或者最好是站在鬥爭以外。在現在的官僚們之中，那些在十月革命中站在布爾塞維克營壘的人，多半都不起很大的作用。至於年青一代的官僚，他們都是老官僚挑選的和教育出來的，並且多半又都是老官僚的子弟。這些人并不能完成十月革命，但是他們却完全適於來利用牠。

自然，在這兩個歷史時期之間，個人的偶然事變並不是沒有影響的。譬如列寧之病和死，無疑的加速了官僚化的過程。如果他多活幾年，那官僚權力之發展，至少在開始的幾年

之中要緩慢一些。但早在一九二六年，當着幾個左派反對派的面前，克羅潑斯卡耶就這樣說：『如果伊里奇還在的話，他多半已經關在監獄內了。』這時候，列寧的憂慮和警告還很新鮮的在她的記憶之中，而且她也沒有懷着什麼幻想，以為列甯個人的無上威權可以抵抗得住反動的歷史潮流。

官僚層所征服的，不只是反對派，牠還征服了布爾塞維克黨。牠打败了列寧的政綱，列寧曾經看出國家的機關『從社會的僕人』轉變成『社會主人』之主要的危險。牠之打败這些敵人：反對派，布爾塞維克黨和列寧，並不是用思想和辯論，而是用牠的社會的壓力。官僚主義的沉重的屁股，壓倒了革命的頭。這就是蘇維埃的特爾米多之秘密。

一九三六年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

二 官僚層是一個階級嗎？

是一個瘤的生長抑或是一個新的機體？

我們的批評家們已經不止一次似立論，說目前的蘇維埃官僚無論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資產階級官僚或勞工官僚都很少有相位之處；又說牠比之法西斯官僚更甚，牠代表一個新的和

更有力的社會結構。這是十分正確的，我們也從沒有對牠閉下我們的眼睛。但是假如我們認為蘇維埃官僚是一個『階級』，那末，我們便迫得立即說明，這個階級完全不類似我們過去所知道的那些有產階級中的任何一個：結果我們的所獲並不大。我們通常稱蘇維埃官僚為一個階層，因此我們指出牠的閉塞的性質，牠的獨斷的統治，以及這個統治層的傲慢，牠們以為牠們的祖先出自婆羅門的神口，而庶民大眾則出自他底分解體的較大部份。但就是這一個定義也當然沒有一種嚴格的科學性。牠的相對的優越性在這一點，即，這個術語的權宜的性質對每一個人都是清楚明瞭的，因為牠印入任何人的心目中，都不會把莫斯科的寡頭貴族和印度的婆羅門等級同等看待。陳舊的社會學的術語沒有也不能替一個新的社會事變準備一個名字，這個事變正在演變的進程（墮落）中，且還沒有獲得穩定的形式。但我們大家都繼續把蘇維埃官僚叫做官僚，並沒有漠視牠的歷史的特性。照我們的意見，這個名字在將來也足夠了。

在科學上和政治上——並非純粹在術語上——這個問題之提出如下：官僚代表一個社會機體上的暫時的生長呢，抑或這個生長已轉變成為一個歷史上必不可少的機體呢？社會的瘤能够成為結合歷史諸條件底一個『意外』（即臨時的和非常的）的產物。一個社會機體之能够形成，只是生產本身底根深蒂固的內在需要的結果（每一階級包括剝削階級在內，都是如此）。假如我們不答覆這個問題，那末整個爭論就會陷於無益的搬弄辭句。

官僚底早期的墮落

每一個統治階級底歷史的辯護就在這一點，——即，牠所領導的剝削制度把生產諸力的發展提高到一個新的水準。一點也沒有懷疑，蘇維埃政制給了經濟一個有力的推動。但這一推動的根源却是生產手段的國有化及計劃的初步，而並不是官僚黨奪經濟管理權這一事實。相反的，官僚主義這一種制度，却成了該國技術和文化發展的最壞的制動機。這件事在某一個時期被這一事實遮掩住了，即，蘇聯的經濟二十年來便埋頭於移植和同化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底生產技術和組織。借用和模仿的時期，不管好壞，還能夠遷就官僚的機械主義，即，一切創意及一切創造力之窒息。但經濟提得越高，他的要求越複雜，則官僚政制之障礙越是不可忍受。他們之間的不斷緊張的矛盾引起不斷的政治震動，引起有系統的消滅一切活動領域中之最傑出的創造份子，這樣，在官僚能夠實行從他本身滲出一個『統治階級』之前，他便和那些發展的要求陷於不可和解的矛盾。這一點的說明可以在這一事實中正確地找出，即，官僚制度並不是他自身所特有的新經濟制度的担当者，也不是沒有了官僚那經濟制度就會無法存在的，他却是工人國家上面的一種寄生的產物。

官僚的全能和塌臺的諸條件

蘇維埃寡頭貴族保有舊統治階級的一切劣點，但缺少牠們的歷史使命。在蘇維埃國家的官僚的墮落中，表現出來的不是現代社會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一般規律，而是在一個落後的革命國家處於一個資本主義環境中的條件之下，上述規律的一種特別例外和暫時的屈折

反映。消費品之稀少及獲得這些消費品的普遍鬥爭產生一個警察出來，他給自己攫取那個分配的機能。外來的仇敵的壓力把國家『保護者』的角色派給那個警察，賦予他以民族的權威，而且容許他雙倍來掠奪這個國家。

但上述官僚底萬能的兩個條件——本國的落後性及帝國主義的包圍——却具有一種暫時的和過渡的性質，而且一定要和世界革命的勝利一道消失。甚至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給計算過，實施一種計劃的經濟，就有可能將美國的國民收入，迅速的抬高到每年兩百兆美元，並因此給全部人口不僅保證其初步需要的滿足，且保證真正的愉快。另一方面，世界革命又會消除外來的危險，這個危險是官僚化的一個輔助的原因。把耗費國民收入底龐大部分於軍備上的需要消滅了，則羣衆底生活和文化的水準甚至會提得更高。在這些條件下，對一個警察分配者的需要便自行消滅。作爲一個巨大合作社的行政機關便迅速的代替國家政權。將來沒有餘地留給一個新的統治階級或一個新的剝削政制，這個階級或政制是生息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

一九三九年

——摘自『大戰中的蘇聯』

三 和平地移去官僚層是可能的嗎？

兩個前途

問題將會更加明瞭，假如我們不從靜的方面而從動的方面去看。蘇維埃官僚集團一方面不生產的浪費了一大部份國民收入，但同時由於本身職能的原故，牠也歡喜這個國家的經濟和文化的發達；國民收入愈大，則牠的特權基金也愈豐富。但和這個一同發生的，就是在蘇維埃國家的社會基礎之上，勞動羣衆的經濟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必會挖掘官僚支持自身的根基。很明白的，就這一個幸運的歷史前途看來，官僚集團倒成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唯一工具——一個惡劣而浪費的工具。

但是因為官僚集團永遠浪費國民收入的一大部份并因為破壞經濟的基本均衡的原故——有人會反駁說——牠遲緩了國家的經濟的和文化的發展。絕對的正確！官僚主義何前無阻的發展必會引起經濟和文化的發達之停頓，可怕的社會恐慌，和整個社會的向下沒落。可是這不但包含無產階級專政的崩潰，同時也是官僚支配的告終。代工人國家而興的將不是「社會官僚的」關係則是資本主義的關係。

我們相信這樣從牠的前途上把問題提出來，將能够一下子澈底探討蘇聯階級性的爭論問題；無論我們認定蘇維埃統治有更多勝利的前途，或相反的是崩潰的前途，官僚集團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成爲一個獨立的階級，而是無產階級上面的一個贅瘤。一個瘤能够長得很大甚

至殺害活着的有機體，但一個瘤永遠不能成爲獨立的有機體。

最後，爲了明瞭得完全起見，我們還可以附帶的說：假使今天在蘇聯馬克思主義的黨執政，那他一定要更新整個的政治制度；他將改變并洗清官僚集團，把他放在羣衆的監督之下；他將改變一切行政的實施，并動辦經濟管理中的許多重大的改良；但他決不進行財產關係的變革，就是說，新的社會革命。

反革命的可能的途徑

官僚集團並不是一個統治階級，但官僚統治的發展將會引起一個新的統治階級的到來：不是有機的經過衰落，而是經過反革命。我們叫史太林主義的機關爲中派主義者，恰恰是因爲牠起了兩種的作用：今天，在已經沒有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并最近將來也還不會有的時候，牠用牠自己的方法保護無產階級的專政；但這些方法不過便利明天敵人的勝利而已。誰不瞭解史太林主義在蘇聯的雙重作用，他就一點什麼都不明瞭。

社會主義的社會將不必有黨而生存，正如不必有國家而生存一樣。但在過渡時期的情形之下政治的上層結構起一種決定的作用。一個發達的和鞏固的無產階級首先要黨像一個自己起作用的先鋒隊在起領導的作用；無產階級藉工會而團結一致；勞動者經過蘇維埃系統與國家密切連系；最後工人國家經過共產國際和世界的無產階級結成一條戰線。官僚集團則已經同時絞殺了黨與工會與蘇維埃與共產國際。這裏，我們用不着解說無產階級制度衰敗的一

巨大部份的罪過是應該由國際的社會民主黨來負的，牠是這樣的塗上了罪惡和叛變的汗點，而且我們要附帶的說，勞拉先生也屬於這個社會民主黨。

但不論歷史責任的分担怎樣，其結果是一樣的：黨，蘇維埃，和工會之絞殺等於是無產階級的政治解體。社會的矛盾不是從政治上去克服而是用行政手段去壓制。這些矛盾沒有政治上的辦法在常態中解決時，在外壓之下，就集累起來，頭一個社會震動，外部的或內部的，或許將分解的蘇維埃社會投入內戰。工人們對國家和經濟失去監督之後，或將許訴之於羣衆罷工，作為自衛的武器。專政的紀律將會破壞。在工人的攻擊和經濟困難的壓迫之下，托辣斯將會迫得破壞計劃的開始并自相競爭起來。統治制度的解體將很自然的在鄉村中得到暴力的和混亂的回響，并將不可免的影響到軍隊中去。社會主義的國家將崩潰而讓位於資本主義的政制。或者說得正確些，讓位於資本主義的混亂狀態。

史太林派的報紙自然會轉載我們的警告式的分析，認做是反革命的預言或甚至，是托洛斯基主義者所表示的『願望』。對於這些官僚機關中新聞紙的傭人們，我們向來只是不做聲的輕視。我們認為，形勢雖很危險，但決不是絕望。無論如何，如果說在戰爭前，和不經一個戰爭而最大的革命支柱已經消失，那是一個極懦怯和直接背叛的行爲。

『和平的』移去官僚集團是可能的？

假如官僚集團已掌握了一切權力和把守住了到權力去的一切門路是真的話，——那末，

真的，一個並非不重要的問題就要發生：怎樣去改造蘇維埃國家呢？而且，這個任務可以用和平手段解決嗎？

我們必須首先規定下面的作為不變之理，——即這一個任務只能由一個革命的黨來解決。基本的歷史任務是在蘇聯內從舊黨的健全分子并從青年建立革命的黨。我們以後將會說在什麼條件之下這些任務才能解決。但我們姑且假定這樣一個黨已經存在了。用什麼方法牠能取得政權呢？早在一九二七年時史太林向反對派說道：『目前的統治集團只有國內戰爭才能除去。』這個挑戰，含着邦拿巴特主義的精神，並不是向反對派而是向黨說的。官僚集團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以後，公開的宣告牠將不再允許無產階級抬起頭來。後來的事變進程使這個挑戰的重量更增加。經過過去幾年的經驗，如果以為史太林官僚集團能够被一個黨大會或蘇維埃大會撤職那真是兒戲的想法。實際上，布爾塞維克黨最後的大會舉行於一九二三年之初，即十二次黨大會。一切以後的黨大會是官僚的儀仗。今天甚至這些黨大會也不舉行了。沒有常規的『合法的』方法可以撤去這個統治的小組織。官僚集團能够被迫將政權交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只有用暴力。

全體的僱傭分子們一定要齊聲『咆哮』的說：『托洛斯基主義者』和考茨基一樣，正在鼓吹武裝暴動反對無產階級的專政。但是讓我們不理牠。奪取政權的問題之成為新黨的一個實際問題，只有在牠已經團結大多數的無產階級於自己周圍的時候。在力量關係的這樣一個劇烈的變更過程中，官僚集團將會逐漸孤立，逐漸分裂。我們已經知道，官僚集團的社會根源存在於無產階級的當中，如果不是在於牠的積極擁護，那末至少存在於牠的『容忍』。當

無產階級跳起來行動時，史太林的機關將變懸在半空中。如果牠還想抵抗，那末對牠應用的不是內戰的手段，而寧是警察性質的手段。無論如何，所要做的不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武裝暴動，而是去掉牠上面的一個不良的生長。

一個真正的內戰不能在史太林官僚集團和復興的無產階級之間發展，而只能在無產階級和反革命的活動力量之間發展。在兩大營壘公開衝突的事變中，官僚集團能起獨立的作用，這是談也談不上的。牠的兩極將轉入敵對的陣營。以後發展的命運自然要由鬥爭的結果來決定。但無論如何，革命陣營的勝利只有在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的領導之下，這政黨自然會在對反革命的勝利中走上政權。

一九三四年

——摘自『蘇聯與第四國際』

蘇聯往何處去？

一 蘇聯的性質尚未為歷史所決定

爲了更明白的了解現在蘇聯的性質，且讓我們對於牠的前途作兩個不同的假定。我們首先假定蘇維埃官僚制度，將被一個革命政黨所推翻，這政黨具有布爾塞維克主義一切特性，而且增加了近時的世界經驗。這樣一個政黨，首先就要恢復工會中和蘇維埃中的民主制。牠能够而且一定恢復蘇維埃各黨各派的自由。牠要與群眾一起并且領導群眾，對國家機關舉行一次無情的清洗。牠要廢除各種等級和勳章，廢除一切種類的特權，并且要限制勞動支付上的不平等，使牠只限于在經濟上和國家機關上絕對必要的地方。牠要給予青年們獨立思想，學習與批評的充分自由。牠要在全國收入的分配上舉行重大的改革，要使這種分配符合於農工大衆的利益和願望。但是關於財產關係，新的政權使用不着採用革命的方法了。牠要保持并且發展計劃經濟的實驗。在這種政治革命以後即在打倒官僚制度以後，無產階級自然要在經濟上實行許多重要的改良，但這并不是另一個社會革命。

現在來說第二個假定：假使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打倒了蘇維埃的統治層，那牠就會在現在的官僚當中，行政長官當中，技術家當中，經理當中，黨部書記以及在一般特權的上層

當中，找到大批的現成僕人。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也還需要把國家機關清除一下。但是資產階級的復辟，較之革命政黨所要清除的人，一定要少得多。這時新政權的主要任務，便是在生產工具上恢復私有財產。首先牠要創造許多條件，使強有力的農民從微弱的集體農場中發展出來，並且使強健的集體農場轉變為資產階級型的生產合作社，——即轉變為農業的股份公司。在工業方面，取消國有財產大概會從輕工業以及生產食物的企業開始。計劃的原則在過渡的時期，要變為國家政權與個人「社團」之間許多調和的形態，這些個人即是那些有力的業主，包含蘇維埃工業中的頭腦，流亡外國的以前的業主以及外國的資本家。雖然蘇聯的官僚們已經大約準備了資產階級的復辟，可是新的政制在財產形式和工業方法上所做的，將不是改良，而是社會反革命。

現在讓我們來作第三種假定：即既不是一个革命的政黨也不是一个反革命的政黨，將來取得政權。官僚們仍繼續統治着國家。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社會關係也不會凝固不動的。我們決不能希望官僚們會為社會主義的平等而和平的和自願的犧牲自己。現時，官僚們既然不顧那些太顯明的不便利而採行軍官階級和勳章，那麼在將來的階段上，他們就必然會在財產關係上去找支柱以支持自身的。有人也許會說，大官僚一點也不注意目前的財產形式是什麼，只要牠能保證他得到必需的進款就行了。這種論斷，不僅忽視了官僚自身的權利現在尚不確定，而且忽視了他們的兒孫的問題。新起的家庭崇拜，不是從雲端降下來的。特權若不能傳給自己的兒孫，那祇有一半價值。而遺囑權又是與財產權不可分離的。所以僅僅做一個托辣斯的經理還是不夠的，必須做一個股票持有者才行。如果官僚們在這緊要的方面得到了

勝利，那就是表示他們變成一個新的佔有階級了。反之，如果無產階級打倒了官僚制度而獲得勝利，那就是保證社會主義革命的復興。因此，這個第三種假定，又使他們回轉到前二種假定來。爲了簡單明瞭起見，我們祇提出這二種假定。

一九三六年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

二 倘若戰爭發生時蘇聯將如何？

戰爭的危險，不過是蘇聯對於其餘世界的依賴性之一種反映，因此乃是一個論據打擊那孤獨的社會主義社會之烏托邦思想。但是現在，這不祥的「論據」才提出來。

要預先列舉未來各國間狗打架的一切因素，這是不可能之事。這種計算若是可能的，則利益之衝突都可以以賬房先生和平計算來終結了。在血淋淋的戰爭方程式中，有太多的未知數。無論如何，蘇聯方面是有很多有利因素的，有些從過去承繼下來，有些是新政制所創成。內戰幾年中外國干涉的經驗又加一次証明了：俄國的最大便利依然是牠的領土廣大。外國帝國主義祇消數日就推翻了蘇維埃匈牙利，——自然也是伯拉庫因（Bela Kun）的癩腳政府的過錯。蘇維埃俄羅斯一開始就被切斷了同周圍各國的交通，却能反抗外國干涉至三年以

譯者按：伯拉庫因是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蘇維埃政府主席。

上。有個時候，革命的領土差不多縮小至舊時莫斯科公國的版圖，但仍能够支持，而且終於獲得勝利。俄國的第二個大便利則是他的口衆多，每年差不多增加三百萬人口，現在全蘇聯人口顯然超過了一萬七千萬人。每一年的徵集，就有一百三十萬人。最嚴格的檢查，無論身體方面的和政治方面的，也不過排除四十萬人而已。可服兵役的人，理論上估量爲一千八百萬至二千萬，實際上則是沒有限量的。

但是領土和人口不過是戰爭的『原料』而已。所謂戰事的『潛力』首先須依賴於國家的經濟強度。在這方面，蘇聯比舊俄羅斯又不知便利了多少。我們以前說過，計劃經濟，從軍事觀點看來，給予了蘇聯以最大便利。僻遠區域，尤其西比利亞之工業化，使草原區和森林區得到完全不同約價值。然而蘇聯依舊是一個落後國家。勞動生產力之低下，生產物品質之拙劣，交通機關之薄弱，——這些拿領土，生產和人口來抵償，祇能抵償一部分罷了。在和平時代，兩個敵對社會制度間經濟力量之決賽，可以設法延緩下去。——不是無期延緩，但延緩一個長時期，——譬如用政治手段，尤其用壟斷對外貿易方法。在戰爭時代，則直接在戰場上決定了。即此便是危險。

軍事的失敗，雖然時常引起大的改變，但其本身罕能造成社會經濟基礎上的紊亂。一種社會制度，若是受了財富和文化高度發展所保證，則必不能爲槍砲所推翻。反之勝利者要採取被征服者的制度和習尚，倘若在進化上不及被征服者的話。財產形式要能爲軍事力量所推翻，那除非是這財產形式已經與本國經濟基礎處於劇烈衝突的地位。德國同蘇聯作戰，若是戰敗，則不僅希特拉場台，資本主義制度也要場台。他方面也難於懷疑：蘇聯若戰敗，則不僅危及蘇維埃統治層，而兼危及蘇聯的社會基礎的。現時德國社會結構之不穩定，乃是由牠的生產力早已超過了資本主義的財產形式。反之，蘇聯社會制度之不穩定，則是由於牠的生產力還遠趕不上社會主義的財產形式。戰爭失敗之危及蘇聯的社會基礎，恰是出於這個基礎平時需要一個官僚主義和一個對外貿易壟斷的同樣理由，——這即是說：出於這個基礎的弱點。

然而我們能希望未來大戰時蘇聯不至於失敗嗎？對於這個坦白提出的問題，我們也要坦白回答說：如果戰爭始終限于戰爭，則蘇聯之失敗是必然不可避免的。在技術，經濟和軍事方面，帝國主義是無比的強大的多。若不是受了西方革命的麻痺，帝國主義一定要剷除那產自十月革命的制度。

人們可以回答說：『帝國主義』乃是一個抽象名詞，其中是充滿着矛盾的。這說不錯；而且倘沒有這類矛盾，蘇聯早已從國際舞台上消失了。蘇聯所訂的外交的和軍事的協定，一部分就是立足在這類矛盾上面。然而倘若沒有看見這類矛盾的限度，那將陷於足以致命的錯誤。恰如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黨派——從最反動的到社會民主黨——間的鬥爭，到了無產階級革命直接威脅之前就要停止一樣，帝國主義者的衝突也是要妥協起來的，爲的禁壓蘇聯的軍事勝利。

外交協定，借用某首相曾經說過的話，不過是『幾張廢紙』而已，並沒有什麼經書規定過：外交協定至少在戰爭爆發之前有效。蘇聯與別國所訂條約，在歐洲某地社會革命直接威脅之時，沒有一條能生效的。假設西班牙——姑不說法蘭西——的政治危機進入了革命的階

段，則路易喬治提議的對於「希特勒救主」的希望必為一切資產階級政府所承受。他方面，倘若西法比等國的動搖局勢終於造成反動勝利的話，則那些條約也要消失得無踪無影的。最惡，即使那「幾張廢紙」在戰爭初期仍保持其效力的話，那也無疑，在戰爭的緊急關頭，勢力的結合是受有力得多的因素所決定，而非受那些以食言為職業的外交家的盟誓所決定的。

自然，倘若資產階級同盟國有了切實的保證，使莫斯科政府不僅在戰爭陣線上站在牠們一邊，而且在階級陣線上也站在牠們一邊，那情形一定會完全不同的。利用蘇聯處在夾攻地位的困難，那些資本主義的「和平朋友」自然要想方法在對外貿易壟斷上和蘇維埃財產法上鑽開一條罅隙。亡命在法國和捷克的白黨所以漸漸開展「保衛祖國運動」，就是完全依靠在這個希望之上。倘若你假定世界鬥爭，祇限於國與國間的戰爭，那麼那些「同盟國」一定有機會達到牠們的目的。沒有革命來干涉，蘇聯的社會基礎一定要場台的，不僅戰敗時候如此，戰勝時候也是如此。

兩年多以前，有個綱領宣佈出來，名叫「第四國際與戰爭」，其中以如下的話概說蘇聯的前途：「國家十分迫切需要日用物品，在此影響之下，農民經濟中個人主義傾向將強盛起來，集體農場內的離心力也將一月一月的增長。……在戰爭的熱空氣之下，我們可以想到……要吸收同盟外國的資本，要罅裂對外貿易壟斷，要減弱國家對於托辣斯之監督，要加劇托辣斯間的競爭，要引起托辣斯和工人的衝突等等。……換一句話說，如果在長期戰爭時候，無產階級仍舊是無所動作的，那麼蘇聯內都的社會矛盾，不僅可能而且必然發展成為資產階級那那巴特主義的反革命。」最近兩年的事變更加增這個預測之效力了。

但以上的論斷絕不會達到所謂「悲觀主義的」結論。如果我們不願意閉起眼睛不看資產階級世界物質上多量的優越之點，不看帝國主義「同盟國」之必然要叛變，不看蘇維埃制度的內都矛盾，那他方面我們更不至於過分估量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無論在對敵國或在同盟國。在一個消耗的戰爭能够徹底計畫經濟勞力之對比以前，制度本身之相對穩定性早已付諸試驗了。認真推測未來大屠殺的人，都一致將革命的或然性或甚至必然性列入於戰爭諸種結果之中。某些人時常提起的少數「職業軍」的思想，雖然同大衛和戈峇式的個人英雄思想一樣的虛幻，但在其虛幻之中却透露出對於武裝的民衆之驚怖。希特勒從來不放棄機會來表明他的「愛和平」，他常提醒：西方若是發生戰爭，必然要惹起新的布爾塞維克風暴。自今以前阻止戰爭爆發的力量，並不是國際聯盟，並不是集體安全公約，並不是和平主義運動，唯一的是統治階級對於革命之自衛性的驚怖。

社會制度，同所有其他現象一樣，必須用比較的方法去估量。雖然有這許多矛盾，蘇維埃制度在穩定性方面仍然是比牠的或然的敵對制度有好多優越處的。國社黨所以能統治德國人民，乃是因於人們忍受不住德國社會矛盾之緊張。這些矛盾并未除去，也未減弱，不過給法西斯禁壓住了。戰爭發生，又要使這些矛盾顯露出來的。希特勒比威廉第二更沒有運氣引導戰爭至於勝利。惟有及時的革命，才能使德國免於戰爭，因此免於第二次的戰敗。

世界輿論將不久之前日本軍人殘殺政府大臣的事件，說做是一種太過熱烈的愛國主義之笨拙的表現。其實，這個殘殺，雖然意識形態不同，仍與俄國虛無主義者用炸彈攻擊帝俄官

僚制度，原於同一的歷史典型。日本人民在亞洲式的農地制度和超近代的資本主義配合壓迫之下痛苦着。朝鮮，滿洲和中國，一俟軍事壓迫稍微鬆懈，就要崛起反對日本的統治。戰爭將使這大和帝國遭受最大的社會災難。

波蘭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畢蘇斯基的政制是一切政制中最無效果的，牠甚至不能減輕農奴性的制度。西部烏克蘭（加里西亞）受了很嚴重的民族壓迫。工人不斷的罷工和反叛，動搖了全國。波蘭資產階級企圖與法國聯合又與德國親近來自保，但牠的詭計是沒有甚麼結果的，除非加速戰爭之爆發，在戰爭中毀滅了自己。

戰爭的危險和蘇聯的失敗，是實在的，但革命也是實在的。革命若是不能先爆發來阻止戰爭，那麼戰爭就將幫助革命的爆發。第二次分婉普通總比第一次容易些。新的大戰發生，無需要等待二個全年又半年才有第一個暴動。而且革命一經開始，這回就不會在半路上停止了。事變長期發展下去，蘇聯的命運將不是由總參謀部的計劃來決定，而是由階級鬥爭的計劃來決定。惟有歐洲無產階級堅決的反對其資產階級以及與資產階級同一營壘的『和平朋友』才能保衛蘇聯，免遭毀滅，及免受『同盟國』的暗算。要是無產階級在他國得到勝利，即使蘇聯戰敗了，那也不過是短時期的事。反之，要是帝國主義仍舊操縱了其餘的世界，則蘇聯無論如何戰勝，都不救護十月革命的遺產。

蘇維埃官僚的代言人，說我們『過輕估量』蘇聯的內力，紅軍等等；這恰像他們以前說的我們『否認』一國建設社會主義之可能性一樣。這類的論據如此不通，使得連交換意見也不可能。沒有紅軍，蘇聯早被擊碎了，分裂了，同中國一樣。惟有紅軍對於未來資本主義敵

人頑強的和英勇的抵抗，才能替帝國主義營壘中階級鬥爭之發展造下順利的條件。這樣說來，紅軍是一個有巨大意義的因素。但這絕不是說牠是唯一的歷史因素。牠能給革命以一種強大的推動，就夠了。惟有革命能完成主要的任務。單靠紅軍是完成不了的。

沒有人要求蘇維埃政府去做國際的冒險，愚笨的行動，以暴力催迫世界事變的嘗試。恰好相反，過去官僚們做着這類嘗試時（如保加利亞，如愛沙尼亞，如廣州等）祇有給反動所利用去罷了，當時左派反對派都會攻擊過的。我們說的，是關於蘇維埃國家一般方向的問題。蘇維埃外交政策和世界無產階級及殖民地民族利益之間的衝突，其最不祥的表現，就是共產國際屈服於保守的官僚主義及其無為宗教之下。

歐洲工人和殖民地民族，站在『維持現狀』的旗幟之下是不能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和戰爭的，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必然要爆發出來而且破壞現狀，恰像胎兒已經長大必然要破壞懷孕的『現狀』一樣。勞動者無絲毫利益來保衛現存疆界，尤其在歐洲，——無論在受本國資產階級統治時候，或在暴動起來反對本國資產階級時候。歐洲的衰落正是爲了這個原故，即是經濟上分裂爲差不多四十個不成其爲民族的國家。有各自的關稅，護照，貨幣制度和保衛民族特殊性的龐大軍隊等，以此成爲巨大的障礙物，攔阻了人類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道路。

歐洲無產階級的任務，並不是永久保持着疆界，而是用革命方法廢除疆界，並不是維持現狀，而是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歐洲合衆國』！

一九三六年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

三 新革命之不可避免

官僚將吞食了工人國家呢，還是工人階級將把官僚肅清出去呢？——這就是目前待決的問題，蘇聯之命運依賴於此問題之解決。蘇聯工人之廣大多數，現在已經仇視官僚政治了。農民羣衆更加以他們健全的庶民仇恨傾注於官僚們身上。倘若說工人與農民相反，差不多未曾走到公開鬥爭道路上來，以此使得那些起來抗議的農村陷於混亂和無力，那麼這不僅是由於壓迫的原故。工人們害怕，推翻了官僚政治之後，將替資本主義復辟開闢道路。國家和階級間的相互關係，本來比庸俗的『民主派』所設想的複雜得多多。沒有一種計劃經濟，蘇聯就將落後幾十年去。在這意義上，官僚政治仍在履行一種必需的職任。但官僚們履行這個職任是走上一條道路，準備這整個體系大爆炸將革命的果實完全拋棄的。工人們是實際主義者。他們對於統治層——至少對於其中與他們比較接近的下層分子——的見解是沒有錯誤的，他們認為這是過去他們自己勝利品某一部份之看管者，他們若有其他可能時候，必然要把這些無恥的輕忽的和不可靠的看守人攆走。這個，必須西方或東方有另一個革命曙光興起時候，才行。

顯然的政治鬥爭之停止，被克臨靈宮的友人和雇員視爲蘇聯政制之『穩定』。事實上不過表示官僚政治的一種暫時穩定罷了。民衆的不滿意愈進愈深了，同時比較年輕的一輩人在這個『開明專制』之下感覺得特別痛苦，——這個政治，其『專制』成分是多過於『開明』

成分的。官僚們一天比一天兇暴的對於活思想之警戒，以及難以容忍的對於『領袖』才能之禮讚，都表明國家和社會一天比一天更加離開了，都表明內部矛盾一天比一天厲害，一種壓迫對着國家的牆壁，國家尋覓一個出路，而且必然不可避免地要找到一條出路。

在如實地估計現時局勢時候，那對於政權代表人之數見不鮮的恐怖主義行爲是具有很大意義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暗殺基洛夫案，他是列甯格勒的有手腕的無顧忌的獨裁者，他那一類人的典型的代表。就是本身上說，恐怖主義行爲是一切之中最不能夠推翻拿破侖主義的寡頭政治的。官僚個人雖然害怕手槍，但其全體則能夠利用一個恐怖主義案件來辯護他們自己的殘暴行爲，而且乘機將他們自己的政敵羅織在暗殺案裏面（季諾維埃夫，加美尼夫等的案件）*。個人恐怖乃是個人暴燥和絕望的一種武器，這類個人大多屬於官僚層自己比較年輕的一輩。但是，同俄國帝制時代一樣，政治的暗殺乃是風暴空氣之百占百驗的預兆，而且預告公開的政治危機即將開始了。

官僚層之採取新憲法，不啻表明他們感到了這個危險，而且先事預防。然而歷史上不止發生一次：官僚的專政到了靠『自由式』政良來挽救時候，祇有削弱自己的力量。新憲法暴露了拿破侖主義。同時又造出一種合法的掩蓋物，以遮蔽反對拿破侖主義之鬥爭。各派官僚在選舉時候之競爭，可以成爲較廣大的政治鬥爭的發端。打擊那『工作不良的政權機關』的

* 此處指的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審判案，而非一九三六年八月的審判案，此書是在此審判案以前寫成的。——英譯者註。

鞭子，可以轉變為打擊拿破侖主義的鞭子。一切徵兆都指示未來發展必然不可避免的要走到民衆中文化上發展的勢力和官僚寡頭政治間的決鬥。這個危機是沒有和平出路的。沒有一個魔鬼肯自願的斬斷他的爪子。蘇維埃官僚不經過鬥爭也不肯放棄他們的地位的。事態發展顯然引上了革命的道路。

由於民衆方面來的壓迫，以及在此情況下政府機關內部不可避免的分裂，那時當權的人的拒抗力會比現在所表現的柔弱得多。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祇能做些假設。無論如何，官僚政治祇能用革命的勢力來推翻的。愈加果敢愈堅決去攻擊牠，則犧牲的人也愈少。第四國際蘇聯支部之任務，便是準備這個並且在順利的歷史情況之下站在羣衆的前頭。今天這個支部還是柔弱的而且被趕往地底下去。但是一個政黨的不合法存在，并非不存在。這不過是一種困難的存在形式罷了。壓迫手段對於即將從舞臺上消逝的階級，能够發揮完全的效力，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三年的革命專政完全證明了這個，但對於革命先鋒隊行使暴力，則并不能救存那個階級，倘若一般說來在彼後發展中蘇聯是註定不會滅亡的話。

官僚政治準備來反對自己的那種革命，將不是社會革命，同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一樣。此時，問題并不是在改變社會的經濟基礎，用這種財產形式來代替那種財產形式。歷史上不僅有社會革命，譬如資產階級代替封建制度的革命，而且也有政治革命，牠并不摧毀社會的經濟基礎，不過脫除上層的舊皮而已（法國一八三〇年和一四八年的革命，俄國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拿破侖主義集團之推翻，自然將發生深刻的社會效果，但在本身上說，還受限制在政治革命界限之內的。

由工人革命產生出來的國家存在至今，這是有史以來未曾有的。這個國家必須經過一些甚麼階段，別的地方尚未寫下來過。不錯，蘇聯的理論和創造者曾經希望那完全清明的和可伸縮的蘇維埃制度，可以容許國家，適應着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各階段，而和平地變形，解體并死亡。然而這裏，又證明實際生活比理論所預感的，複雜得多。一個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被註定來完成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爲了這個歷史特權，就一切徵象看來，無產階級必須以第二次補充的革命，反對官僚專制的革命，來償付。新革命的綱領，大部分須看爆發時候情勢如何，國家達到的水平如何以及國際狀況如何，而定。至於綱領的基本原素，則已經明白了，而且已由本書（即『被背叛了的革命』——編者）指明出來了，本書就是根據蘇維埃制度矛盾之分析，做一個客觀的推測。

問題并不在於拿這個統治黨派來代替那個統治黨派，而是在於改變那管理經濟和指導文化之方法。官僚專制政治必須讓位於蘇維埃民主政治。批評權利之恢復和選舉的真正自由，乃是蘇聯未來發展之必需的條件。這樣就使蘇聯黨派（自布爾塞維克黨以下）的自由復活起來，工會也復活起來。輸入民主制於工業之中，意思是說根本修改計劃，使適合於工人利益。自由討論經濟問題將減少了因官僚錯誤和搖擺而起的額外浪費。虛耗許多金錢的玩藝兒，如蘇維埃宮殿，新戲院，地道電車等，將停止，而用此種經費建築工人住宅。『資產階級分配的平等，品級制將立刻廢除了。那些輝煌的勳章將送進熔爐裏去。青年人將有機會，能自由的呼吸，批評；做出錯誤，并發育長大起來。科學和藝術將解脫現時的鎖鍊。最後，外交政

策亦將回轉到革命的國際主義之傳統去。

十月革命之命運，現今比任何時候更密切地與歐洲及全世界命運連繫着了。蘇聯的問題，現在在西班牙半島解決，在法國解決，在比利時解決。到了本書出版時候，情勢將比今日在馬德里城下進行國內戰爭時候，無比的明白得多。蘇維埃官僚若是成功了，以他們那個背叛階級的所謂『人民陣線』政策，保證西班牙和法國反動勢力的勝利（共產國際正在盡其所能向這方面做去的），那麼蘇聯將看見自己已經置身在崩潰的懸岩之上。那時，提出於議事日程的，多分是資產階級的反革命，而不是工人反對官僚政治之暴動。可是，倘若無論改良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如何聯合怠工，西歐無產階級仍然尋到了到政權去的道路，那麼蘇聯歷史上就專開闢一個新的篇幅。歐洲革命之第一個勝利將像電閃一般，透過蘇維埃羣衆，使他們屹立起來，提高他們的獨立精神，喚醒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的傳統，削弱拿破侖主義的根基，其對於第四國際的意義將不減於十月革命對於第三國際的意義的。惟有走上這條道路，第一個工人國家才能為社會主義的未來時代而救全起來。

一九三六年

——摘自『被背叛了的革命』

無條件保衛蘇聯

一 『無條件保衛蘇聯』

A.

『無條件』保衛蘇聯的意義何在？牠的意義就是說，我們不把任何條件放在官僚身上。牠的意義就是說，我們不管戰爭的動機和原因而獨立保衛蘇聯的社會基礎，假如這個基礎受了帝國主義方面的危機威脅的話。

某些同志說：『假如紅軍明天侵入印度，並開始鎮壓該地的革命運動，難道我們在這一個場合中也擁護牠嗎？』這樣提出問題的方法並不是完全站得穩的。首先我們不明白為什麼把印度牽入來。這樣問不是更簡單嗎：假如紅軍在蘇聯威脅工人的罷工或威脅農民對官僚的反抗，我們擁護不擁護牠呢？外交政策就是內政的延長。我們從來沒有答應擁護紅軍的一切行動，因為紅軍便是邦拿巴特官僚手裏的一個工具。我們却答應只保衛工人國家的蘇聯，而且只保衛蘇聯內部屬於工人國家的東西。

一個巧妙的詭辯家可以說：假如紅軍不管牠所完成的『工作』的性質如何，而遭逢印度

蜂起羣衆的打擊，這將更削弱蘇聯。關於這一點，我們這樣答覆：藉紅軍之助將印度革命運動壓服將較之紅軍在印度的反革命出征步隊的插話式的失敗，對蘇聯的社會基礎有無比大的危險。在每一種情形中，第四國際將曉得如何去區別：紅軍在何時何地的行動只是邦拿巴特反動的一個工具，又牠在什麼地方保衛蘇聯的社會基礎。

一個受反動的騙子領導的工會，組織一個罷工來反對黑種工人加入產業的某一部門，我們擁護這樣一種可恥的罷工嗎？當然不。但是讓我們假定：工廠主想利用這一罷工來壓毀這個工會以及一般的使工人們不能有組織的自衛，在這種情形中，我們將視保衛這個工會爲一件當然的事情，不管牠的領導如何反動。爲什麼同這樣的政策不可以應用到蘇聯呢？

一九三九年十月

——摘譯自『再論蘇聯性質』

B.

蘇聯的工人階級已經完全不能用合法的手段來改造國家了。要反對官僚制度，必須是革命的鬥爭。第四國際忠於馬克斯主義，堅決地排斥個人的恐怖如像排斥一切其他政治冒險一樣。要掃除官僚制度，祇能靠目標明晰的羣衆運動，反對剝削者，寄生者與壓迫者。

如果蘇聯要回復到資本主義，還必須有一次社會的反革命，那末要牠向前發展到社會主義，也就非有一次政治的革命不可。蘇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以全世界的革命運動爲基礎，將

以武力打倒官僚制度，恢復蘇維埃的民主主義，廢除龐大的特權，且保證其真能向社會主義的平等前進。

★

★

★

★

大戰發生，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一定要保護蘇聯，雖然蘇聯存在着寄生性的官僚制度，而克里姆宮中住着無冕之皇，這因爲蘇聯的社會制度，雖然有許多畸形與創傷，但比之以腐朽的資本主義，却代表着一個偉大的歷史的進步。在大的大戰中如果帝國主義國家失敗了，那末不僅使國家的形式爲之毀壞，而且資本主義的基礎都要摧毀，其結果則以國家財產來代替那私人財產，如果蘇聯失敗，則不僅表示蘇維埃官僚的崩壞，而且繼以資本主義的混亂來替代那國家的與集體的財產。在這些情形之下，政治路線之何棄何從，那是不言而喻的。

★

★

★

★

『極左派』深怕蘇聯一旦勝利，會使巴拿帕脫的官僚制度之地位愈加鞏固，這完全是誤解了蘇聯的國際關係及其國內的發展。只叫蘇聯對生產工具的私有制度尚未恢復之前，任何營壘中的帝國主義都不會與蘇聯調和的。在大戰開始的時候，任便交戰各國的集團怎樣的結合，等到在戰爭的程中，他們相互間一定諒解起來，藉以犧牲蘇聯。蘇聯如果要想在大戰中不致失敗，那末祇有在一個條件之下，即牠能得到西方或東方的革命的援助。但是那拯救蘇聯的唯一道路——國際革命——同時也就是蘇聯官僚制度之致命的打擊。

一九三六年

——摘譯自『第四國際與蘇聯』

政治局決議草案說：「反蘇戰爭之準備只表示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與勝利的無產階級之間底階級鬥爭在一個擴張的基礎上的再生產而已。」

這是正確的嗎？絕對正確。但該決議案繼續往下說：「凡是像我黨的反對派那樣懷疑戰爭的此種性質的……等等。」反對派懷疑戰爭的此種一般的階級意義嗎？胡說！事實並非如此。連一點影子也沒有。只有那些自身已完全陷於迷亂而希圖誣陷別人的人才能够說出相反的話。但這就是說，這種一般的階級意義，這對於我們大家都是無可否認的。應該成了任何和每一個錯誤和墮落的掩飾嗎？不，意思並非如此。牠不作這種掩飾。如果我們先天的，永遠的承認某一個領導是唯一可思議的，天生的領導，那末，對正確領導的每一批評都好像是拒絕社會主義祖國的保衛和嚮召一個暴動了，但這樣一種立場雖則是干脆的否認了黨。照你們說，在戰爭的事變中，黨將只致力於保衛的目的。但保衛如何實行，別些人物時常把此點告訴黨。或者，我們把問題再提得更簡單明瞭一點：我們，反對派對社會主義祖國的保衛懷有什麼疑心麼？一點也不是。我們不僅希望着參加這一保衛，而且希望教別人一點東西。我們懷疑史太林有能力立定一個正確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路綫麼？我們實在如此，而且幾乎懷疑到極度。

在真理報上他的一篇最近的文章裏，史太林提出如下的問題：「在臨近的和帝國主義我作戰中，反對派真的反對蘇聯的勝利麼？」我們姑把這個問題底厚顏的魯莽置之不問。我們不

想現在來談到寡小心估量底史太林派方法的特性——史太林的粗暴和不忠實的特性。我們且照他所提出的問題本身來看，並給牠一個答覆。只有白軍才能『在臨近的和帝國主義作戰中，反對蘇聯的勝利。』反對派是爭取蘇聯的勝利的；牠已證明此點，牠將來也在行動中繼續證明此點，不下於任何人。但史太林並不關心於此。他心裡實際上有了一個不同的問題，只不過不敢明言吧，那就是：「反對派真的以為史太林的領導不能保證蘇聯的勝利麼？」對的，我們就是這樣想。

李諾維也夫：正確呀！

托洛茨基：反對派以為史太林的領導使勝利更困難。

莫洛托夫：黨又如何呢？

托洛茨基：黨已被你們絞殺了。反對派認為史太林的領導使勝利更加困難。反對派對中國革命就不斷指出這一點。牠的警告已被事變証實，証實到可怕的程度。現在必需改變政策，不要等到國內發生同樣災難的試驗。每一個反對派，如果他是一個真正反對派而不是冒充的，將在戰爭中在前綫或後方接受黨付托他的任何職務，并履行他的義務到底。但在戰爭之前夜或戰爭中，沒有一個反對派放棄他的為改正黨底路綫而鬥爭的權利與義務。——這在我黨內已往往是如此的——因為這裡藏着勝利的最重要的條件。總括起來說：擁護社會主義祖國麼？擁護！擁護史太林派路綫麼？不！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

——摘譯自對聯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的演辭

保衛蘇聯反抗外國干涉及國內敵人——從皇黨及從前的地主以至「民主主義者」，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進攻，是每一個革命工人，尤其是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基本和無可爭辯的義務。在這個問題上態度模糊和保留是與信仰國際左派反對派相矛盾的，而且這實質上就反映着小資產階級極左派動搖於帝國主義世界與無產階級底世界之間。

把蘇聯當作世界無產階級的主要堡壘而加以保衛，抵抗世界帝國主義及國內反革命的一切進攻，是每一個自覺的工人之最重要的義務。

中派官僚的政制的政策，成了無產階級專政底最嚴重和直接的危險，有系統的反秉政中派的鬥爭是第一個工人國家底復興，鞏固和發展的主要部分。

一九三一年四月四日

——摘自『蘇聯發展諸問題』

社會主義只有在近代技術的最高成就的基礎上和國際分工的基礎上，才能實現。

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不是一個自足的民族進程，而是國際革命的一個重要部分。德國的和歐洲的無產階級之取得政權，比起在蘇聯境內建立一個閉門自足的社會，前者的任務是無限地真實些和切近些。

無條件的保衛第一個工人國家的蘇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內和國外的敵人！

但是要保衛蘇聯，便必須對眼睛不被蒙蔽。國際無產階級要對蘇維埃官僚實行監督。無情地暴露民族改良主義的和特爾米多的傾向，這些傾向是由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推演出來的。

一九三二年

——摘自『以後怎樣辦？』

二 中俄衝突與保衛蘇聯

蘇維埃共和國假如決定了為中東路而開戰又怎樣呢？我已經說過，假使事情鬧到戰爭，那末只是這一件事實已足說明戰爭不是為中東路問題，而是為的更重要的問題。不錯，單就中東路說，他比一九一四年引起戰爭的愛爾茨格磋商事件，為嚴重得多。然而問題并不在中東路。東方的戰爭，無論他的直接口實是什麼，必然在第二天變成反對蘇維埃「帝國主義」的鬥爭，換言之，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等於如愛爾茨格磋商的明顯的戰爭變成反對普魯

十軍國主義的戰爭一樣，而且其所用力量要無限的大些。

——摘譯自『極左派與馬克斯主義』

★ ★ ★
 如果中國工人與農民的革命已經勝利，而我們現在解決中東路問題，那就最容易不過了。中東路必須歸還勝利的中國人民。但事實是這樣：中國統治的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援助之下，已把中國人民擊敗。若把中東路歸還□□□，就等於聳恿中國的巴拿帕式的革命者來反對中國人民。明白了這些，什麼問題都順手了。除此之外，還有同樣重要的事實，□□□在財政上與經濟上都沒有能力得到中東路，使中東路不為旁人所染指。事實上是獨立的滿洲也要在日本保護之下而存在。□□□能容忍這些，並不是偶然的。把鐵路歸還□□□，則牠事實上變成□□□借貸外債的擔保品。那麼鐵路反落到真正的帝國主義之手，變成他們在遠東最便利的經濟上與軍事上的路綫，來反對潛伏的中國革命與蘇聯。我們已經知道，帝國主義者是很會利用『民族自決』的口號來進行他們自己的污穢事業。我不相信馬克斯主義者在這樣情形之下，還要負責去擁護這個口號。

……不論史太林莫洛托夫如何，不論他們如何流放反對派等等，……（原點——編者）站在歷史的觀點上，站在國際無產階級與中國革命利益的觀點上，我們能不能想出一個比蘇聯更好的主人來管理中東路？問題是應當這樣提出才對呀。

……如果蘇維埃真的要從事於戰爭，則毫無疑義的，反對派真要完全犧牲自己來保護十月的

勝利。

——摘譯自與美國記者的談話

★ ★ ★
 中國與蘇聯如果發生戰爭，反對派的任務如何，……：用一切方法阻止連送軍火到反革命的中國，用一切方法幫助蘇維埃共和國得到軍火。

——摘譯自『極左派與馬克斯主義』

三 蘇波戰爭與保衛蘇聯

外交政策是國內政策的繼續

我們保護蘇聯內部的什麼？不是保護那些與資本主義國家中相似的，而正是保護那些與牠們相異的東西。在德國，我們也主張以暴動反對統治的官僚制度，但祇為要立刻推翻資本主義的財產。在蘇聯則官僚制度的推翻必須是為保存國家財產。祇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贊成保護蘇聯。

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懷疑蘇聯的工人應該保護國家財產，他們不僅應該反對官僚制度的寄生主義，而且也要反對私有權的傾向，例如集體農場中的貴族階層。但歸根結蒂的說，外

交政策卻是國內政策的繼續。如果在國內政策上，我們一方面保護十月革命的勝利品，另一方面對官僚制度作不可調和的鬭爭，那末在外交政策上也得採取同樣態度。誠然，勃朗諾·R. 是從這個事實出發的，即以為「官僚的集體主義」業已全線勝利，而他向我們保證說，沒有一個人會危害到國家財產，因為希特勒（還有張伯倫？）之欲保存國家財產，你看好了，會和史太林一模一樣。抱歉得很，我們不能不說勃朗諾·R. 的保證是毫無價值的。在勝利的情形之下，希特勒靠得住要在起初要求把一切剝奪自德國資本家的財產歸還給他們；然後他要替英國，法國與比利時的資本家以同樣的方式恢復財產，以便和他締結協定來犧牲蘇聯；最後，他曾使德國成為蘇聯最重要的國家企業的包工者，以利於德國的軍事機構。現在希特勒是史太林的同盟者與朋友；但希特勒假使得到史太林的幫助，在西線獲得了勝利，他在明天就會掉轉槍頭來反對蘇聯。而張伯倫如果勝利，也會和希特勒一樣地幹。

保衛蘇聯與階級鬥爭

人們在保護蘇聯這一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最經常的是由於對「保護」的方法具有一個不正確的了解。保護蘇聯的意思，決不是與克林姆宮的官僚制度相接近，接受牠的政治，或與牠同盟者的政治相妥協。在這個問題上，與在其他所有的問題上一樣，我們始終完全站在國際階級鬥爭的立場上。

在一本小小的法國雜誌：「做什麼」上，最近說：因為「托洛斯基主義者」對於英法所

採取的是失敗主義的立場，因此對於蘇聯也是失敗主義者。換句話說，如果你要保護蘇聯，你必須對於她的帝國主義的同盟者放棄失敗主義的立場。「做什麼」估計「民主國」將是蘇聯的同盟者。現在這些聖人們將說些什麼我們不知道。不過這是不怎麼重要的，因為他們所應用的方法的本身是腐敗的。對蘇聯今天所從屬或明天會從屬的帝國主義營壘放棄失敗主義，就是推敵人營壘中的工人到他們政府的方面去；這意思就是普遍地放棄了失敗主義。在帝國主義戰爭的條件之下放棄失敗主義，就等於放棄社會主義的革命——以「保護蘇聯」的名義放棄革命——將使蘇聯陷於最後的解體與死亡。

像共產國際所解釋的「保護蘇聯」，有如昨天的「反法西斯主義鬭爭」，乃是以放棄獨立的階級政治為基礎的。無產階級被他們以各種不同的理由，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中，總是變成爲某一資產階級營壘反對另一營壘的一個輔助力量。與此相反，我們中間有一些同志說，因為我們不要成爲史太林及其同盟者的工具，所以我們放棄保護蘇聯。不過由這一點，他們祇表示出他們之了解「保護」與機會主義者的了解在本質上適相符合；他們不是用無產階級獨立政治來思想的。事實上，我們之保護蘇聯正與我們保護殖民地，與我們解決一切問題的態度一樣，不是擁護某些帝國主義政府，反對別一些帝國主義政府，而是無論在殖民地或宗主國中，都用國際階級鬥爭的方法。

我們不是一個政府黨；我們不僅在資本主義的國家中，而且在蘇聯，也是一個不可調和的立於反對地位的黨。我們的任務（「保護蘇聯」也是其中之一）並不經過資產階級的政府，甚至不經過蘇聯政府來解決而是完全由於用鼓動來教育羣衆，由於對羣衆解釋何者他們應該

保護，何者應該推翻。這樣的一種『保護』不能發生立即的奇蹟似的結果，但我們甚至並不想作一個奇蹟的創造者。照事實而論，我們是一個革命的少數，我們的工作一定要進行，以便受過我們影響的工人們可以正確地估計事變，不會被事變所怔住，且替他們自己的階級準備一種普遍的情緒，去用革命來解決我們前面的任務。

保護蘇聯，在我們是與準備世界革命這一任務相符合的。祇有那些與革命利益不相衝突的方法才是允許的。保護蘇聯對於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關係，正與策略任務與戰畧任務的關係一樣。一個策略是從屬於一個戰畧目標的，牠無論如何不能與後者相對立。

論領佔區域問題

當我在寫這幾行文字的時候，紅軍佔領區的問題還不曾明朗。電訊都是互相矛盾的。因為雙方都說了許多謊；不過舞台上的實際關係無疑地還是極不確定的。大部分的佔領區域，無疑地將成為蘇聯的一部分。用什麼方式呢？

讓我們暫時設想着：莫斯科政府按照牠與希特拉締結的協定，佔領區中不觸動私產權，而祇限於法西斯式的『統制』。那末這樣的讓步將具有深刻的原則的性質，而在蘇維埃制度的歷史上也許會成為新的一章的起點。因而在我們方面，也許會是我們對蘇維埃國家的性質將作一新估計的起點。

不過，更可能的，乃是在這計劃成為蘇聯一部分的區域中，莫斯科政府將實行沒收大

地主的產業，並將生產工具予以國有化。這情形之所以是最可信的，並非因為官僚制度還忠於社會主義的政綱，而是因為官僚制度既不情願，也不能夠與佔領區中的舊統治階級分享政權，以及政權所繼承的特權。這裏自然會發生一個類比。拿破侖第一用軍事獨裁的方法停止了革命。但當法國軍隊侵入波蘭之時，拿破侖簽發一道命令：『廢除農奴制度』。這方法之所以採取，並非由於拿破侖對農民的同情，也不是由於民主的原則，而是由於這一個事實，即拿破侖獨裁的本身並不是依靠着封建的而是依靠着資產階級的財產關係。祇因史太林的拿破侖式獨裁不是以私產而是以國有財產作基礎，所以紅軍之侵入波蘭，在事情的本質上說，其結果要廢除私有的資本主義財產，這樣，才能使佔領區域中的制度與蘇聯的制度相符。

這方法，——『剝削剝削者』——性質上是革命的，在這情形中卻是以一種軍事官僚的方式來完成的。在新區域中為要成立新制度，必須號召羣衆獨立行動，即使是以最謹慎的話來號召，也是必須的，但明天，為要保證官僚制度對於覺醒的革命羣衆所佔有的優勢，無疑要以殘酷的警察方法來鎮壓這種號召了。這是事情的一方面，但還有另外的一面。為要能夠與希特拉作軍事同盟來佔領波蘭，克林姆宮在長期間欺騙了，而且還在繼續欺騙蘇聯與全世界的羣衆，因而使自已共產國際的隊伍完全解體。對我們而論，首要的政治標準並不是在此地或那裡變更了財產關係（雖然這些事件的本身也許是重要的），而寧是世界無產階級的意識與組織的改變，寧是提高他們的能力來保護過去的勝利與完成新的勝利。從這一個觀點，而且是唯一具有決定意義的觀點看，莫斯科的政策，整個說來，完全保持着反動性質，且還是世界革命路上的主要障礙。

不過我們對於克林姆宮與共產國際的一般的估計，並不改變這個特殊的事實，即在佔領區中財產的國有化，本身是一個進步的方法。我們一定要公開地承認這一點，假使明天希特勒揮兵東進，要在東部波蘭恢復『法律與秩序』，先進的工人將反對希特勒，保護那由邦拿巴特主義的蘇維埃官僚所建立新的財產形式。

我們的路線還是不變！

我們說過，生產工具的國有化，是一種進步的方法，但這種進步性是相對的，牠的比重依賴着其他一切因素的總和。因此，我們必須首先確定：由官僚的專制與寄生主義所操縱，領土擴張，披上『社會主義』方法的外衣，能夠增加克林姆宮的威望，能夠產生一種幻想的即以爲無產階級是能以官僚的陰謀等等來代替的。這種罪惡遠遠超過了史太林在波蘭實行改良的進步的內容。爲使佔領區中，以及蘇聯內部的國有化財產成爲一個真正進步的基礎，這就是說，爲使牠成爲社會主義的發展，那必須推翻莫斯科的官僚制度。因此，我們的政綱保有着牠全部的效力。事變並不會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只需要我們加以正確的解釋罷了。必須明白懂得在蘇聯的性質中以及在她的國際地位中，包含着尖銳的矛盾。藉助於名詞的玩弄（『工人國家』——『不是工人國家』），人們是無法解脫於這些矛盾的。我們一定要依事實來看待事實。我們一定要把真實的關係與矛盾來作出發點，藉以建立我們的政策。

我們不能以任何歷史的使命託付給克林姆宮。過去與現在，我們都反對克林姆宮之奪取

新領土。我們贊成蘇維埃烏克蘭的獨立，如果白俄羅斯人自己願意，我們也贊成蘇維埃的白俄羅斯。但在同時，在紅軍佔領的一部分波蘭中，第四國際的信從者，當沒收地主與資本家財產時，分配土地於農民時，建立蘇維埃與工人委員會等時，必定要起最堅決的作用。當這樣幹的時候，他們一定要保持他們政治上的獨立，當他們投票選舉蘇維埃與工廠委員會時，必須爲此等機關脫離官僚制度而鬪爭，他們必須在對克林姆宮及其當地代理人表示不信任的精神中，進行革命的宣傳。

讓我們假定希特勒掉轉他的武器來反對東邊，侵畧紅軍佔領的區域。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第四國際的隊員無論如何不必改變對克林姆宮寡頭統治者的態度，但將出赴前線爲目前最迫切的任務，即以軍事力量來抵抗希特勒。工人們會這樣說：『我們不能把推翻史太林的工作讓給希特勒；那是我們自己的任務』。當這反希特勒的軍事鬥爭進行之際，革命的工人將努力與紅軍隊伍中的戰鬥員發生最親近的同盟關係。當布爾塞維克列寧主義者一方面手拿武器予希特勒以打擊時，同時要進行反史太林的革命宣傳，準備在第二個階段，也許在最近的階段上推翻他。

這樣的保衛蘇聯，自然與官方目前在『擁護祖國！擁護史太林！』的口號之下所進行的保衛有霄壤之別。我們的保衛蘇聯是在這樣的口號之下進行的，即『擁護社會主義！擁護世界革命！反對史太林！』爲使羣衆的意識中不把這兩種『蘇聯的保衛』混淆起見，必須明白而確切地知道怎樣針對着具體的環境來規定口號。不過最重要的，必須明白地確定究竟我們在保衛什麼，究竟我們怎樣保衛牠，以及我們保衛牠來反對誰。如果我們對自己的任務沒有

一個清楚的觀念，那我們的口號祇能在羣衆中發生混亂的印象。

結 論

在目前，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改變我們對蘇聯的原則立場。

戰爭加速了各種政治的過程。牠也許會加速蘇聯革命再生的過程。但牠也可以加速牠最後墮落的過程。爲了這個理由，所以我們不得不辛勤地與撇開成見地追蹤着那些因戰爭而引起蘇聯內部生活的更變，以便我們能對他們作及時的估計。

我們在佔領區中的任務，根本上還是與我們在蘇聯本部的任務一樣；但唯其佔領區中的任務是被事變以一個極端尖銳的形式提出來的，故牠們更能使我們弄清楚我們對蘇聯的一般任務。

我們一定要在這樣的方式中規定我們的口號，即讓工人們清楚地看到究竟我們在蘇聯所保衛的是什麼（國有財產與計劃經濟），我們正在進行的無情鬭爭是反對誰（寄生的官僚與他們的共產國際）。我們一定要一刻都不看漏這一個事實，即在我們看來，推翻蘇維埃官僚問題是從屬於保持蘇聯生產工具國有化的問題的；而保持蘇聯生產工具國有化的問題，在我們看來，又是從屬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問題的。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摘譯自『大戰中的蘇聯』

★

★

★

★

假如希特勒在他尚未爲革命摧毀之前，又在革命尚未推倒史太林之前，進攻烏克蘭，怎麼辦呢？第四國際的戰士在這個場合將抵抗希特勒的軍隊，像他們在西班牙參加共和軍方面抵抗佛郎哥一樣嗎？我們完全和衷心的贊成一個獨立的（不受希特勒也不受史太林支配的）蘇維埃烏克蘭。但是假如在尚未獲得這一獨立之前，希特勒企圖搶奪那個正受史太林派官僚統治的烏克蘭，又怎樣辦呢？第四國際答覆：我們將保衛這個受史太林奴役的烏克蘭而抵抗希特勒。

一九三九年十月

——摘譯自『再論蘇聯性質』

四 芬蘇戰爭與保衛蘇聯

史太林之進攻芬蘭自然不僅僅是爲了保衛蘇聯。蘇聯的政策是受拿破崙主義官僚所領導的。這些官僚首先關心的是自己的權力，自己的威望和自己的進款，他們保衛自己比保衛蘇聯精明得多了。他們保衛自己，不惜犧牲蘇聯，不惜犧牲世界無產階級。這一點，在蘇芬衝突全部發展之中，表現得太明白了。因此我們不能直接地或間接地替侵畧芬蘭代負絲毫的責任。這個侵畧不過是拿破崙主義官僚政策練子中單獨一環吧了。

與史太林團結一致，辯護他的政策，分担他的責任，如三倍無恥的共產國際所做的，這是一件事情；向世界工人階級解釋，無論史太林犯了多大罪惡，我們不能容許世界帝國主義粉粹蘇聯，重建資本主義，化十月革命國家為殖民地，——這又是一件事情。這個解釋也就是我們保衛蘇聯的根據。

★ 我們保衛蘇聯，與莫斯科『皇帝』政策並不相干；我們從下面兩個根本理由出發：第一，蘇聯失敗將供給帝國主義以新的資源，並能多延資本主義社會好幾年殘喘；第二，蘇聯社會基礎，若是清除了寄生的官僚主義之後，還能够保證經濟上和文化上無限量的進步，至於資本主義社會基礎，則除了繼續腐爛以外沒有其他的前途了。

★ 必須認為工人國家是從無情的歷史試驗室裡產生出來的，而不是一個『社會主義』教授拿指頭挖鼻子沉思之中想像出來的。革命者底責任在於保衛工人階級已有的勝利品，即使這勝利品受了敵方力量壓迫變為畸形。凡不能保衛舊陣地的人，永遠爭取不到新的陣地。

一九四零年四月二十五日

——摘譯自『芬蘭事件底總結算』

五 基本原則

第四國際已堅決聲明，在一切帝國主義國家內，不管究竟是在蘇聯的同盟國內也好，在

蘇聯的敵國內也好，無產階級政黨在戰爭中必須以奪取政權的目的，發展階級鬥爭。同時，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又一定不要忽視保衛蘇聯的利益（或殖民地革命的利益），而且在真正必需的場合，一定要採取最堅決的行動，比方，罷工，怠工等。自從第四國際成立這個規則以後，列強的結合已急激變化。但這個規則本身尚保留牠的全部効力。假如英法明天威脅列甯格勒和莫斯科，英法的工人應採取最堅持的手段，以阻止兵士及軍需品的輸送。假如希特拉本人為局勢的邏輯所迫而把軍需品送給史太林，德國工人在這個具體的場合，却反而沒有理由罷工或怠工，我希望，沒有人會提出任何其他解決辦法。

一九三九年十月

——摘譯自『再論蘇聯性質』

六 帝國主義國家工人怎樣援助蘇聯？

並非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是帝國主義的。事實正相反，大多數還是帝國主義之下的受難者，有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家無疑的要利用戰爭來掙脫奴隸的束縛。他們的戰爭可不是帝國主義的而是具有解放意義的。國際無產階級的責任在於幫助被壓迫國家反對壓迫者的戰爭。同樣的責任，也適用於對蘇聯的援助，戰前或戰中倘能產生任何別的工人政府，國際無產階級也一樣的要予以援助。每一帝國主義政府同工人國家或殖民地國家作戰時的失敗，都

是較勝一籌。

不過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不能經過牠們自己的政府來援助反帝國主義的國家，不管那兩國在這一時期內的外交與軍事的關係如何。假使兩政府那時正締結着暫時的，其本質是不可靠的聯盟時，則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安穩繼續站在自己政府之反對派的階級立場上，要用自己的方法來援助那非帝國主義的『同盟者』，這些自己的方法，就是國際階級鬥爭的方法。（進行有利於工人國家與殖民地國家的鼓動，不僅反對他們那不可靠的同盟者而已；有時實行抵制與罷工，有時則放棄抵制與罷工等。）

在戰爭中援助殖民地國家或蘇聯，無產階級絕不與殖民地國家資產階級政府或蘇聯的特別爾米多官僚相結合，相反的，他們要對這兩者都保持着政治上的完全獨立。革命的無產階級給正義的與進步的戰爭以助力，可贏得殖民地的與蘇聯工人的同情，可增強第四國際在那些地方的威望與影響，且增強牠的力量，俾得推翻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與蘇聯的官僚制度。

一九三八年九月

——摘自『過渡綱領』

七 誰保護蘇聯，誰幫助希特勒？

假使我們繼續在法國，比利時與捷克等國中推動階級鬥爭，那末史太林派及其崇拜者會

那樣的回答我們，說我們減弱了蘇聯同盟者的力量，損害了蘇聯自身。其結果則不論我們的主觀如何，希特勒必然增強了。我們不能預言階級鬥爭將在何時奪取政權。可是希特勒却可以在我們奪取政權之前，得到了戰爭的勝利。希特勒做了歐洲的統治者，將延遲或摧毀我們全體的鬥爭（法比捷等國）。所以繼續我們階級鬥爭的活動，勢必實際上幫助了希特勒。

這一種論理上似乎很能自圓的解釋，不過重覆了帝國主義者與社會愛國主義者（即社會帝國主義者）的老調，他們時常用以反對那敵對的革命者的。李卜克內西以前不是被稱為沙皇的走狗，而列寧不會被誣為霍享索倫的偵探嗎？這樣的事情多到不可勝數。

有人或許會這樣來反駁我：那時還沒有蘇聯呢。是呀，這話很對。但這事實只能證明那社會愛國主義的思想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已經存在了，而這個最偉大的歷史事變却沒有將社會愛國主義者的特別淺薄性加以絲毫的改變。

當大戰之時，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人——不僅是那些僱傭的壞蛋，誠實的工人也是如此——都說：如果沙皇戰勝了，那末他的哥薩克騎兵將解散我們的黨，破壞我們的工會，毀滅我們的報紙與房屋了。普通的法國工人，也是很信任地聽着雷諾德爾，加興等的宣言，叫我們從德皇和他的軍官們的進攻之下保護共和國與民主主義。至於蘇維埃國家的存在，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牠是因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行動而產生的。保護蘇聯——對的——但我們還必須保護資本主義國中的勞動組織。這兩個任務在政治上是合而為一的，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都很密切地聯繫着。保護目前存在着那樣的蘇聯（關於這，我們與陶里奧，脫蘭脫，等的學說沒有共同之點）正像我們保護任何勞工組織（雖然牠是被更壞的改良主義者所領導的），

去反對法西斯主義與軍事反動的進攻一樣，都是我們不容拒絕的任務。整個的問題只是在——怎樣保護與用什麼方法來保護？

馬克思主義者說：只能用那些受我們所控制的方法，我們能自覺地應用的方法，即是說，只能用各交戰國內進行革命階級鬥爭的方法。不論戰爭的命運如何，革命的階級鬥爭，最後總能予工人階級以最好的成果。這無論用於保護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勞工組織與民主機關，或用於保護蘇聯，都無二致。我們的方法在根本上並無差異。無論在何種情形或任何藉口之下，我們都不能將我們的革命任務交給我們那民族資產階級的手中。

但是，這些聰敏的俗人們會那樣回答我：這一切在「理論上」也許是很好的。可是誰能不同意：在法國進行階級鬥爭會加強希特拉的地位，會增加爆發戰爭的可能性，且能增加希特勒在此戰爭中取得勝利的機會？而法西斯的德國不是蘇聯的主要敵人嗎？蘇聯的失敗，不將長期地推遲世界革命的發展嗎？這種論據，又不過是那夏德曼，韋爾斯，樊迪文，德曼，嘉與這類人的老調重彈，是一種完全錯誤的論據。只要把馬克斯主義批評這一個魔術棍拿去一擊，牠就會打得粉碎的。

法西斯主義不是別的，只是擠到最高權力而且賦與神秘主義的階級利益調和的觀念。假使法，比，捷的工人團結在「他們」的資產階級之周圍，則必然的要驅使德國工人團結在國社黨的左右。社會愛國主義只能給種族主義的轉動機加油。要削弱希特勒的力量，就得煽起階級鬥爭的火燄。歐洲國家中任何一國的偉大的工人運動，比之於蘇聯與其他國家的結合，更能破壞種族的狂瘋的軍國主義。蘇聯與其他強國訂立反德的聯盟，這是予瘋狂的種族主義以

新的武器，且使那衝突的帝國主義國家倒向德國那方面去，因為他們所關心的不是什麼民主主義與蘇聯，而是赤裸裸的勢力的均衡（如波蘭，日本，英國等）。

假使與蘇聯聯盟（多久呢？）的國家中之無產階級在戰時必須幫助牠的資產階級，那末這個政治路線一定在和平時就得開始了。因為我們在阻止希特勒的勝利之前，先得避免戰爭本身的爆發。這就是在和平的時候，去幫助那反對希特勒的帝國主義國家及早得到優勢。可是這却不多不少地正是完全拋棄了階級鬥爭。而這又正是那不名譽的史大林宣言的主旨。他在目前，在和平的時候，贊成了法國的——當然也是比國與捷克的——資產階級之軍事罪惡。此外還能有什麼別的作用呢？

假使我們不能以階級鬥爭的方法，減弱與蘇聯同盟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力量，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加強人民對於其統治的信心。那末，假使受着本國無產階級之擁護的法，比，捷克的軍國主義，在戰爭的進程中，掉轉他們的槍頭去對準蘇聯——這是很能想像與很可能的——一種發展——我們將怎樣辦呢？如果我們自己騙自己，以為在這個時候，我們能強烈地反對他們，那簡直是瘋傻的說法。龐大的羣衆是不能實行這種劇烈的轉變的。軍國主義在我們幫助的下所取得的權力，不能這樣容易地棄掉。在這樣的情形之中，我們所處的地位，不僅會使我們成爲消極的，而且是積極的破壞蘇聯的代理人了。

不過從這些前提中，史大林派却很遲疑地做出他們最後的結論。爲要保持他們國會反對派之神氣，他們高呼着法國的參謀部中有法西斯蒂。這種論據只證明了史大林派社會愛國主義的整個空虛與愚蠢。講到要利用帝國主義間的衝突，那末利用這一法西斯的集團去反對另

一法西斯的集團，都是可以辦到的。莫索里尼是法國的同盟者，現在當然也成為蘇聯的同盟者了。其實德，法的衝突，決不是法西斯反對民主主義的衝突，而是飢餓的與過飽的兩個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這衝突，即使法國自身變成爲法西斯蒂，也還是存在着的。

法國共產黨以爲假使軍隊中「肅清」了法西斯的份子，他們準備投票贊成帝國主義的軍隊，這證明他們已經和勃龍（社民黨首領——譯者）無異了，他們所關心的不是什麼蘇聯，他們唯一所焦慮的只是法國的「民主主義」。他們立下了崇高的目標，要把純潔的民主主義注射進凡爾賽軍隊（凡爾賽一詞的意義，含有公社的與凡爾賽條約兩層）的軍官團中去。怎樣注射呢？經過達拉第的政府。『到處建立蘇維埃！』政權給達拉第！但是，這位偉大的民主主義者達拉第，做過兩年軍事部長（一九三二——三四年），爲什麼一點也不設法去肅清軍隊中的法西斯蒂，拿破崙主義者與保皇黨人呢？是不是因爲那時的達拉第，還不會受人民戰線的魔水的洗禮呀？也許那聰敏與誠實的『人道報』會給我們解決這個啞謎吧？牠還能回答我們吧；爲什麼達拉第在一九三四年二月的武裝反動之第一個壓迫之下就投降了？我們可以替他們回答嗎？這因爲激進社會黨是財政資本各黨中之最卑劣，最懦弱與最奴性者，只要希內特，羅契爾特，邁爾西愛等先生的腳跟一頓，激進黨人總是會跪下來的，首先是赫禮歐，一會兒之後，達拉第也就跟着跪下去了。

讓我們假定着，人民戰線能取得政權，並且表演式地（就是爲了欺騙羣衆）能把次等的反動分子從軍隊中肅清出去，還能解散（紙上空談）幾個有組織的匪棍團體。那末根本上能有什麼改變嗎？軍隊呢——那時也會和現在一樣——將仍舊是帝國主義的主要武器。軍隊的總參

謀部，也仍然是以軍事陰謀反對勞動者的大本營。當戰爭之時，軍官團中之最反動最堅定與最無情的份子會取得優勢。意大利與德國的例，告訴我們帝國主義大戰乃是訓練軍官的一個最好的法西斯學校。

更次，那些對蘇聯態度尙未明顯，戰爭立場還是一種秘密的國家，又是怎樣呢？不列顛的工會運動，早經在阻礙牠對自己的帝國主義者的鬥爭了，他們的理由就是大不列顛也許會被迫去保護蘇聯的。這些鬼崇的政治家，自然會求助於史太林，不僅很奏效，而且還很合理呢。假使法國的史太林主義者能够答允去『控制』他們自己資產階級的外交政策，那末英國工黨當然也能玩這套同樣的把戲。可是波蘭的無產階級又該何所適從呢？因爲波蘭的資產階級和法國是聯盟者，而對德國又要表示最親密的友誼！

無論你用何種藉口都好。總之，國內和平的政策，總是表示着社會主義者對於帝國主義的最卑賤的臣服，尤以帝國主義進行其最血腥氣的最恐怖的工作時爲然。上一次大戰，已經表示出愛國主義的結果了。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從那『國內和平』的學校裏出來，完全沮喪了，政治上已經毀滅，他們沒有信仰或勇氣，失去了名譽與良心。德國的工人在戰後已經取得了政權，可是社會民主黨的首領們却把牠交還給將軍們與資本家們。假使法國的勞工領袖們當大戰之結果不像是卑劣的政治上的廢人，那末今日的法國也許已經是社會主義的領土了吧。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國內和平，不僅給全世界的民衆判定了前所未聞的犧牲與負擔，而且又讓那腐敗的資本主義延長了幾十年的生命。一九一四——一九一八的利於『本國

民族」的國內和平，只是準備了一次新的帝國主義戰爭，這戰爭有使各民族完全滅亡之虞。不管目前的社會愛國主義者在何種口號（『保衛祖國』，『保護民主』，『保護蘇聯。』）之下去準備那新的『國內和平』，總之這一新叛變的結果，將使現代文化完全瓦解。

★

★

★

★

當然！蘇維埃的官僚制度需要保護蘇聯，同樣的也要建設社會主義。不過他們之從事此種工作，乃是按照了他們自己的方式，這種方式與國際革命的利益，因而也與俄國無產階級的利益有極大的矛盾。這種官僚制度不信任國際的革命。牠只看到危險，困難與後退，而看不到那偉大的可能性。至於法國，比利時以及全世界的史太林的應聲蟲，那對他們自身或對他們的黨都沒有絲毫的信心。他們把自己不看成——其實在是如此——革命羣衆的首領，而只是在這些羣衆講台的面前，做蘇維埃外交的代理人，他們之升沉，完全與這外交相一致。因此，第三國際的官僚們，由其內在的機構，就不能在戰時反對資產階級的愛國主義者。所以這班卑怯的壞蛋如嘉興，若克摩脫，高脫華爾特等，總是用盡一切可憐的藉口。以圖掩蓋他們對於那愛國主義『輿論』之狂流的投降。這樣的藉口，——只是藉口而不是理由——他們在『保護蘇聯』這口號上找到了。多利奧具有嘉興與杜克洛斯一樣的政治面貌，他是同一學派中的產物。雖然畢但尼斯小學的孩子都知道：法國資產階級與希特勒的諒解，其方向一定是反對蘇聯，可是多利奧却多麼容易地和『保護蘇聯』的思想決裂，而代之以『與希特勒的

諒解』！這樣的一位先生只能愚弄史太林派的官僚，同時又很快地會背叛蘇聯。這些政治家們只缺少一件小小的東西——脊骨。他們在史太林小組組織的前面卑躬屈膝，只是在訓練他們對本國資產階級的順從。

因為他們的特徵就是出奇地無恥，他們就急劇地轉過來攻擊革命的國際主義者，罵我們擁護希特勒。他們忘記了希特勒是只能被德國的工人階級來征服的，而這個階級因為第二和第三國際的罪惡，現在已組織潰散，完全無力了。但牠是會再度起來的。為使牠重新站起腳來，使牠具有生氣，那末一定要發動國際的，特別是法國的工人運動。

勃龍，齊洛姆斯基，陶來斯等的每一個愛國主義的宣言，就是給種族學說（民族主義）以一份新的糧食，其最後結果則幫助了希特勒。世界無產階級之不妥協的馬克斯主義的布爾塞維克的路線，無論在平時戰時，都揭穿那瘋狂的種族理論，因為牠在行動上證明出人類的命運乃是由階級鬥爭而不是由民族戰爭來決定的。這難道還須加以證明嗎？第三國際追隨着第二國際之後，最後地把那反希特勒的『共同』進攻代替了階級鬥爭。這在實際上，只能幫助希特勒主義。現在已經有無可爭辯的事實與數字來給我們證明了，例如奧國國社主義的生長，薩爾的投票，布希米亞的選舉。用民族主義的武器來反對法西斯主義，只是火上加油。而法比，捷克或任何地方的無產階級革命之初次真實的勝利，在希特勒的耳中聽來，將是喪鐘的響聲。誰如想談社會主義的問題，那誰就該懂得這一點ABC。

如內無產階級的軟弱，發生了戰爭，其結果如何，我們不能預言。陣線將變動着，國家的疆界也將虜滅。航空技術發展到目前這個階段，一切邊界將被破壞，一切國家的領土將

被摧殘。只有那最赤裸裸的反動者，他們時常戴着社會主義者，甚至共產主義者的假面具，能在這種情形之下，號召勞動者去聯合「牠的」資產階級以保護「牠的」陣線。勞動者的真實任務，乃在利用資產階級戰爭的危難，推翻牠的統治，從而廢棄那害工業與文化的國家疆界。

在戰爭第一個時期，資產階級是最有力量的。但在戰爭的持續中，牠的力量却與月而俱減。在另一方面，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只要牠能對愛國主義的豺狼保持獨立，那牠的地位與力量，將不僅是每日地，而且是每小時地鞏固與增強起來。在最後的分析中，戰爭的命運不是取決於戰線，而是取決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相互關係。只有那勝利的革命，纔能補償戰爭的禍害與紛擾。那時不僅是法西斯主義，就是帝國主義也將受着致命的打擊。那時不僅蘇聯外部的敵人將被擊敗，就是那產生史太林死黨的野蠻獨裁之內部矛盾，也將被克服下去。無產階級專政聯合起我們這支解的與無血的大陸，牠將挽救那瀕於危殆的文化，將建立歐洲的蘇維埃聯邦。牠將侵入美洲，且能推動東方被壓迫民衆的興起。全人類將聯合成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且建立起一個諧和的文化。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譯自「新國際」

八 我們有權對革命抱樂觀

——紀念俄國十月革命——

一九三九年八月卅一日，在著名報紙巴黎晚報週刊上載着八月二十五日法國大使古龍德和希特拉最後一次會晤的一篇極富於教訓意義的談話（這項情報的來源無疑是古龍德本人）。希特勒大言炎炎，誇好他和史太林訂立的公約（「一個現實主義的公約」），且「憂慮」德法將要流血。

「但是」，古龍德反駁說，「史太林表現了很大的奸詐。（在戰爭的場合中）真正的勝利者將是托洛斯基，閣下有想及這一層嗎？」

「我知道」，元首答道，「但英法爲什麼給波蘭以完全的行動自由呢？」云云。

這些先生們喜歡用某人的名字來代表革命的怪物。但這一點，在外交關係方已破裂時候，當然不是這次戲劇式談話的要旨。「戰爭將不可避免的喚起革命」；這位帝國主義民主國的代表自己已寒慄入骨，但他却用來恐嚇他的敵人。

「我知道」，希特拉答道，彷彿這是一個久已解決了的問題似的。「我知道」，真是奇怪的對話！

古龍德和希特勒兩者都是代表披靡歐洲的野蠻主義。同時他們兩者都不懷疑他們的野蠻

主義將被社會主義革命所征服。這便是目下全世界一切資本階級國家統治階級的警覺。他們的完全腐敗是階級力量關係中的最重大的因素之一。無產階級有一個年青而依然薄弱的革命領導。但資產階級的領導却腐爛到根了。在他們無法挽救之戰爭之始，這些先生們便預先相信他們的政制的破產。光是這一事實，在我們看來，就一定是不可克服底革命的樂觀主義的根源！

一九三九年

